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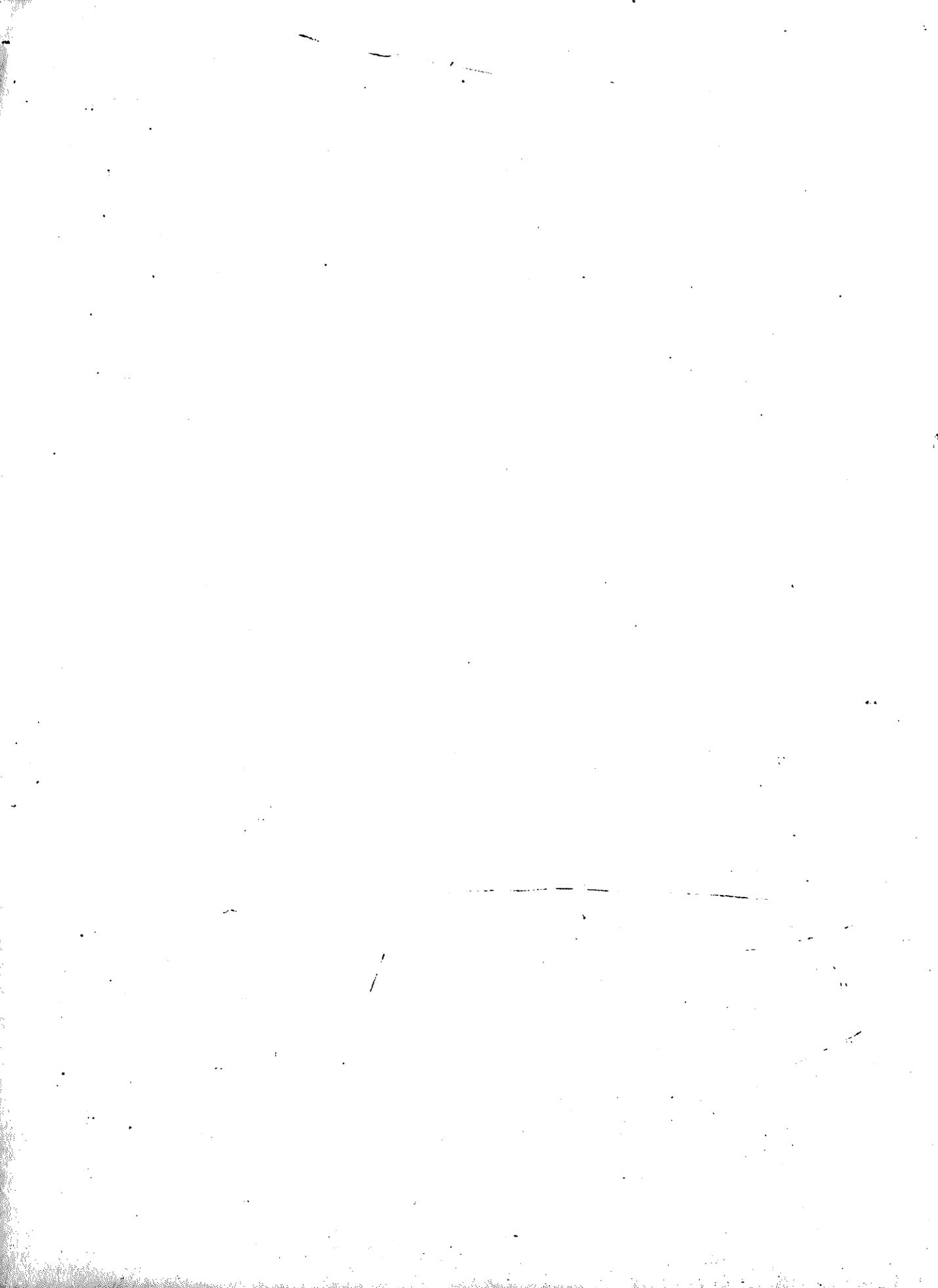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与批判

5

1976

报导
五八



毛主席语录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目 录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论走资派 庄 岚 (3)
- 集中批邓 促工业生产 中共高桥化工厂委员会 (10)
- 我们是怎样同政治谣言作斗争的?
..... 海运局燃料站供水船队党支部 (13)
- 杂 文 勃列日涅夫的传心术和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靳 戈 (16)
- 李生兄弟
——论邓小平和林彪 舒浩晴 (18)
- 资料: 二十年代莫斯科的红场事件 (21)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朝阳农学院学习散记……………上海赴朝阳农学院参观学习小组 (24)

广阔天地新大学

——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函授大学……………上海市教育局函授组 (31)

经济问题研究

说古道今批洋奴

——江南造船厂一个退休老工人的口述…………… (37)

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上海自行车三厂革命委员会 (42)

文化战线

努力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方泽生 (44)

读洪皓《江梅引》……………顾易生 王运熙 (50)

掀掉这筵席!

——读苏修短篇小说《宴会》有感……………雍 昌 (56)

附:宴会…………… (59)

批判孔孟之道

司马光登台一年……………康 立 (67)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论走资派

庄 岚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已经发表十周年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十年，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不断深入的十年。

十年前，毛主席在《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都是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总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不断深化对走资派的认识，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如同认识任何事物一样，我们对党内走资派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毛主席就指出，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以后，毛主席又反复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九六二年，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总结了我們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和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中，毛主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进一步指

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揭示了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和活动规律。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论述，可以领会得更加深刻了。在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斗争中加深对走资派的认识，这是一切革命的人们所共同经历的认识过程。

为什么会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产物。社会上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是产生走资派的阶级根源；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产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外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存在，则是产生走资派的国际根源。

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地主、资产阶级被推翻了。但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还要挣扎，还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如同每个阶级或政治集团都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人物来组织政治斗争一样，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要复辟，也要寻找他们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一是失去了生产资料和政权，二是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因此，他们自己已没有资格来充当头面人物了。他们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比他们亲自出马要好得多。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果然在我们党内找到了那些不愿前进，不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少数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作他们的代理人。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就是。他们挂着共产党领导人的招牌，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业。社会上的地主、资产阶级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正如广大革命群众所说：“台上的走资派是保护伞，台下的地主、资产阶级是墙脚”。社会上的地主、资产阶级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以走资派为靠山的，而走资派则是以社会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我们只要看一看邓小平登台大刮右倾翻案风，社会上的

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是那样高兴，邓小平行将垮台，他们又是那样歇斯底里地为他鸣冤叫屈，以至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拚着老命来保他，就可以明白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了。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是新老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就好象封建卫道者贾政之流把贾宝玉颈子上挂着的那块“通灵宝玉”当作万万不可丢失的命根子一样，资产阶级在失去生产资料和政权后就是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命根子的。从经济根源上来说，党内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施放糖衣炮弹所打中的靶子，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预见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果然，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就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就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露的大量事实来看，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走资派，都是在政治上、生活上、作风上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当了权，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他们通过把持着的一部分政治领导权、生产管理权和产品分配权，采取各种狡猾的手法，攫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富为己有，特别贪婪，比资本家还厉害。

“窥一斑以见全豹”。我们只要剖析一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怎样顽固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就可以明白走资派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

邓小平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特别反感。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邓小平反对；大跃进中出现了干部能上能下，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军官下连队当兵，工厂取消奖金制度、计件工资等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邓小平恨之入骨。他一有机会就反攻倒算，叫嚷什么“过去实行的计件工资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物质刺激要同精神刺激并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又公然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叫嚷搞单干，搞“三自一包”，搞“利润挂帅”。他说什么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黑猫白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搞单干也可以，这就是要在农村翻所有制改造的案，就是要恢复所有

制方面已被取消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搞“利润挂帅”，则是那个“白猫黑猫”论在工矿企业的具体化，就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捞到利润就是好猫，目的显然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工矿企业的性质，变公有制为私有制。

前年年底，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毛主席又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强调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且指出，由于我国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对一向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邓小平是一个警告。但是，邓小平本性未改，毛主席的指示又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他破门而出，疯狂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完全继承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妄图把物质刺激、“管、卡、压”一套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出来。他鼓吹“台阶论”，破坏老、中、青三结合，妄图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搞成等级关系、猫鼠关系。他攻击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炮制什么科学院的《汇报提纲》，鼓吹要给专家们配后勤，配小汽车，配好房子，配书记，妄图重新培植精神贵族，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打着“整顿”的旗号，搞什么全面整顿，就是要整掉无产阶级专政，整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全面恢复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邓小平那样疯狂地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样热衷于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就说明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同他们这些走资派，这些修正主义大官们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反修防修，就要跟走资派作斗争，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乃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走资派产生不仅有阶级根源、经济根源，而且还有国际根源。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修正主义也是国际性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活动便总是同国际上的帝、修、反互相呼应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每日每时都在指望着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希望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他们的代理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是把林彪、邓小平之流说成是“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吗？同样地，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都是和国际上的帝、修、反联系在一起的，最终都要倒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怀抱。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

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这就说明，只要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存在一天，国内产生走资派的政治思想根源就存在一天。

新老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主要是通过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来实现的。党内走资派适应国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需要，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要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建国以来的斗争实践证明，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主要就是坚持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的路线，就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搞修正主义路线，就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最危险，就是因为窃据党和国家权力的党内走资派可以利用职权强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一条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立即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爆发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在苏联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同赫鲁晓夫相呼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要放宽无产阶级专政，多搞些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这就煽动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现在邓小平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煽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那样拼命地保邓小平，就是因为邓小平推行了一条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大官们利益的路线。邓小平虽然同那些玩火的亡命之徒们可能是不相识的，但是由于他推行的那条路线代表了这一小撮人的利益，因此，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破产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以百倍的疯狂跑出来对他们的代理人护驾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走资派要推行一条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要遭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反。走资派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害怕真理，害怕群众，就必然搞伪装欺骗，玩弄阴谋诡计，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干阴谋勾当的能手。他无中生有，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抓住一些个别问题和表面现象，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结党营私，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他用歪曲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手段，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打出“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搞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喊出“关心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技术”的口号，妄图在教育、科技领域内开历史的倒车。我们无产阶级必须研究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策略，以便彻底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被走资派的伪装所迷惑，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鲁迅说过：“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拳~~，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并同这些最危险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对付走资派，最根本的就是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各种伪装认清走资派的反动面目。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要对付走资派，就要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群众运动，就搞不起来。同走资派作斗争，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来进行。毛主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交给广大群众，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别看走资派挂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招牌，有那么美丽的画皮，只要群众一起来揭露，很快就会露出原形；别看走资派张牙舞爪，不可一世，象个“庞然大物”，只要群众一起来，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从党内分化出去，一般来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又由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很会用假象骗人，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往往会迷惑一些人，会给我们的斗争带来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

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因此，我们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实践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党员干部，大多数经过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极少数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如邓小平之流，则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终于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我们在同走资派作斗争中，一定要区别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把他们批倒批臭。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要这个历史过程没有完结，只要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些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在我们党内就会不断出现走资派。即使老走资派没有了，还会出现新的走资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多久，走资派就会走多久。毛主席指出：“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走资派还在走，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牢固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哪里出现走资派，就在那里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

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走资派所走的复辟倒退的道路，是一条绝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是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的，一小撮走资派总是极端孤立，注定要失败的。建国二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来，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同走资派开展斗争，不断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现在，我们在同邓小平的斗争中，又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论述，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准备通过曲折的道路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去消灭一切害人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集中批邓 促工业生产

中共高桥化工厂委员会

短短几个月来，在集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的推动下，我们厂同全国各地一样，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广大干部和工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大激发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今年第一季度，全厂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十三点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五，主要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历史同季度的最高纪录。事实雄辩地证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打着“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直接插手工交战线，妄图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他一方面散布我国经济战线所谓“一团漆黑”、“积重难返”的谎言，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会抓经济”的里手，以救世主自居，兜售修正主义黑货。邓小平在工交战线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是他推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厂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在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过程中，联系经济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对邓小平在工交战线搞复辟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剥去了邓小平“会抓经济”的画皮。

邓小平不是公开主张搞物质刺激吗？这是赤裸裸的修正主义货色。工人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胡说什么只有靠物质刺激才能调动我们的积极性，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极大诬蔑。难道我们工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大力，流大汗，是为了钞票吗？”在邓小平的心目中，钱能通神，奖金是万能的。工人同志通过切身的体会，认识到物质刺激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它腐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决不相信物质刺激这一套。毛主席高度赞扬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有通过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几个月来，我们厂的广大工人同右倾

翻案风对着干，同物质刺激对着干，自觉地急国家所急，以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抢挑重担，涌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五车间的工人，知道兄弟单位急需环氧丙烷这种化工原料，就主动承担增产任务。他们千方百计地挖掘原有生产装置的潜力，使班产量从三吨半提高到五吨。大批促大干，越干越有劲。今年二月份我厂出现三次修改生产计划的动人景象，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修改后的计划比原计划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而实际上超额完成原来计划的百分之二十六。工人同志用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计报酬，不计时间，表现了社会主义主人翁的精神。他们兴奋地说：“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对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的有力一拳。”

邓小平不是恶狠狠地叫嚷“管、卡、压”吗？这实际上是妄图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用严密到连大小便都要计算时间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管、卡、压”，那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管理企业的办法。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就是这样搞的。那时，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厂的情况也是“干部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从厂部到车间、班组，对工人一举一动横加限制。有些试验室的大门也不准工人踏进，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制，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文化大革命以来，逐步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确立了工人是企业主人的地位，企业管理的面貌焕然一新。而邓小平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叫嚷什么“管理混乱”、“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要“全面整顿”，妄图恢复“管、卡、压”的修正主义秩序，这充分表明他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通过批判邓小平的复辟言行，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他们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而邓小平叫嚷‘管、卡、压’，把工人当敌人，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啊！邓小平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干部，滋长做官当老爷的作风，妄图把干部推到工人的对立面去，我们决不上当。”党委还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教导，自觉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进一步摆正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党委全体成员带头转变作风，实行“三三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车间干部坚持参加劳动，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现场，做到“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同时，还注意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创造的企业管理的鲜经验，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邓小平不是竭力鼓吹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吗？这是在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打出“一切为了现代化”的旗号，公开主张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并无耻吹嘘这是一个“大政策”，是个十足的洋奴。联系我厂建厂的历史，工人们迎头痛击了邓小

平的洋奴哲学。我们厂是一九五八年遵照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建设起来的石油化工厂。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出现过“三次下马”的情景。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厂才有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七五年的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加十一倍，品种扩大了二倍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通过联系我厂实际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进一步提高了我们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的自觉性。工人同志表示：高桥化工厂是靠自力更生办起来的，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为发展我国石油化工作出新的贡献。

邓小平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我们就要对着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制订了完整的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刘少奇、林彪一样，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目的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通过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经济战线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更加坚定了我们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我们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认真总结了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的经验。广大干部树立了工人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进一步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广大工人群众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以主人翁的姿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不断发展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

不是有人担心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会影响生产吗？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厂革命和生产呈现的大好形势，就是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取得的。四月初，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地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妄图扭转批判邓小平的大方向。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丝毫动摇不了广大群众批判邓小平的大方向，反而激起了我们工人阶级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广大工人和干部在贯彻执行党中央两个决议的日子，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批邓的火力更猛了。他们挥戈上阵，抓住这个反面教员，对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批判，猛烈抨击。工人群众一致表示：“我们一定要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以出色的成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四月份，我厂的形势更加可喜，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九点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一。五。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是怎样同政治谣言作斗争的？

海运局燃料站供水船队党支部

去年夏季前后，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指使下，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反革命的政治谣言，为右倾翻案风的逆流推波助澜。在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又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破坏和干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我们海运局燃料站供水船队的海轮供水船，终年战斗在黄浦江上，流动性大，接触到不少政治谣言。供水八号轮的船员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看到了阶级敌人在这股谣言风背后的刀光剑影。他们提出：“坚决反击，揭露谣言，决不让革命的航船迷失方向。”船员们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同反革命政治谣言进行了坚决斗争。我们党支部抓住这个典型，带动全船队广大党员和群众，以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锐利武器，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批邓，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坚定了革命的航向，夺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几个月来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粉碎政治谣言，根本的一条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深入批邓。什么地方批邓搞得不好，谣言就没有市场；什么地方批得较差，谣言就会泛滥。一小撮坏家伙不是造谣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吗？其实，只要充分揭露了邓小平大搞翻案复辟的罪行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可以一眼看穿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言。邓小平妄图复辟，但是“翻案不得人心”，在全国人民中孤立得很。只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他拍手叫好，公开拥护他。这就说明，充分发动群众，抓住批邓这个大方向，不断提高识别修正主义路线的能力，才能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样，广大群众在政治谣言袭来时，就能坚持革命大方向，及时识破政治谣言，抵制政治谣言，风里雾里不迷航。

广大船员还深入分析了政治谣言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内在联系。他们经过分析懂得，政治谣言是邓小平右倾翻案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股反革命的思潮。它的根子，上有走资派，下有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而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就是邓小平。制造政治谣言，贯穿于邓小平右倾翻案活动的全过程。我队群众概括了邓小平的造谣三部曲：当邓小平进攻时，指挥清华大学那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写诬告信，极尽造谣

诬蔑之能事，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从这里打开缺口；当邓小平退却时，则用政治谣言作掩护，抹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阶级内容和阶级实质，歪曲斗争的性质，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邓小平失败了，还把谣言当作垂死挣扎的救命稻草。一小撮坏家伙或者移花接木，嫁祸于人，或者信口雌黄，肆意中伤，或者煽阴风，点鬼火，蛊惑人心，煽动闹事，搞反革命暴乱，直到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的纳吉。广大船员通过分析认识到，那些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情，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反映。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大家斩钉截铁地说：“政治谣言是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肮脏武器，我们革命人民必须彻底揭露它，坚决取缔传谣的自由市场。”

抓住邓小平这个造谣的总头子，我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中火力批邓，打一场粉碎反革命政治谣言的进攻战。工人理论队伍发挥了尖刀班的作用。他们编了革命导师批判政治谣言的语录，给广大船员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他们收集了历次机会主义头子靠谣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事例，作为反面教材；他们出战报，出黑板报、大批判专栏，经常举行批判会。在理论队伍带动下，广大船员挥戈上阵，做到了人员分散，批邓火力集中；工作流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积极主动。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大船员不仅做到了不信谣，不传谣，而且通过对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造谣的分析，进一步认识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某些规律。他们根据革命导师的教导，回顾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到造谣中伤从来就是反动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政治报复的工具”。（列宁：《政治讹诈》）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同样承袭了反动阶级的造谣衣钵。刘少奇一伙在炮制《二月提纲》时当面造谣。林彪叫嚣要靠“说假话”、造谣言来办复辟的“大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伙同陈伯达起哄，发动了一场谣言攻势。邓小平接过造谣的肮脏武器，说明他走的是历史上机会主义头子的老路。他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不得人心，不可能光明正大，只能乞灵于政治谣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掩盖事实，蒙蔽真相。总而言之，邓小平同历次机会主义头子一样，政治上输了一理，就不得不靠谣言混日子。

为了有效地粉碎政治谣言，我们特别注意揭露和批判邓小平一伙肆意造谣的反动政治目的。鲁迅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动。”广大船员从大量事实中看到了，散布政治谣言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复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前夕，谣言不是象流弹一样到处乱窜吗？林彪反党集团大造谣言，不正是为了发动反革命政变吗？这就说明，从政治谣言中可以洞察阶级斗争的动向，洞察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和反革命策略。广大船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社会上的谣言多么五花八门，造谣的手法如何变化多端，矛头却始终很集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百般美化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翻案复辟活动。当邓小平的猖狂进攻正在势头上时，各种美化邓小平的政治谣言应运而生，邓小平简直成了万能的“救世主”。

《红楼梦》里的薛宝钗说过一句话：“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邓小平正是想借谣言风浮上天去，它集中反映了谣言制造者所希望的事实，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广大船员怒不可遏地说：“就在政治谣言的烟幕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剑出鞘’了。我们一定要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去扫荡这一小撮反革命！”

我们不仅要抵制谣言，驳斥谣言，而且要放手发动群众，对谣言进行彻底追查。我们采取了领导带头，个别谈心，班组学习和组织宣讲等形式，大讲阶级敌人制造政治谣言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使广大群众都懂得追查谣言的重要意义。谣言通过什么渠道传来，在什么范围内传播，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发动群众，严加追查。在追查过程中，我们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少数群众听信谣言，上当受骗，主要是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我们就着重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在揭露和批判谣言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觉悟。对于一小撮造谣生事的阶级敌人，则坚决打击。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广大船员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追查政治谣言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内容、性质和反革命目的等方面的关系，追查政治谣言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关系，坏人就难以藏身了。

在这场斗争中，广大船员反复学习了列宁的教导：“在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诬蔑愈来愈厉害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应当更加沉着，应当驳斥谣言和诽谤，考察事件的历史联系和目前革命进程的政治意义即阶级意义。”（《三次危机》）大家分析了当前两条路线斗争和历次路线斗争的联系，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逐步明确了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许多同志在实践中越来越懂得，我们同邓小平的斗争，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批邓越是深入，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揭露得越是充分，批判得越是深刻，广大群众也就越加清楚地识破了各种谣言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斗争教育了群众。全船队的无产阶级政治空气浓了，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传谣的渠道堵住了，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崭新气象。广大船员朝气蓬勃地投入了批邓战斗，在供水过程中，在公共场所、家庭和里弄中，一发现有人传谣，就加以抵制。

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迅猛地向前发展，全国到处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还存在着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政治谣言就不会绝迹。正如鲁迅所说的：“谣言家是极其无耻而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乌龟壳里爬出来又躲进去，不断变换造谣的手法，从来没有停止过。粉碎阶级敌人散布的政治谣言，这是同新老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想继续破坏捣乱，“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革命人民的回答是：反革命在哪里造谣生事，就在哪里顺藤摸瓜，严加追查，把造谣生事的坏家伙揪出来，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勃列日涅夫的传心术 和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新 戈

这几年，苏联科学界盛行研究“传心术”。据说，一方在莫斯科打出一张牌，在西伯利亚的另一方凭着某种神秘的“波”就可以“感知”这是一张什么牌。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倒真的看到了这种“传心术”的妙用。

你看，邓小平在北京，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两地相距何止万里。可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两人“传”起“心”来真叫来得个快。

邓小平一伙叫嚷文化大革命把“思想搞乱了，组织搞乱了，阶级队伍搞乱了，企业管理搞乱了”，现在要把方向“扭”过来。勃列日涅夫之流立即遥相呼应，叫嚷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混乱”，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一切”，是中国“历史上的悲惨的一页，这一页是迟早会翻过去的”。一个要“扭”，一个要“翻”，发出的音节虽然不同，但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波”——姑且承认有这种东西吧——的频率大约是完全一样的吧。

邓小平攻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出“反对平均主义”的旗号，污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马上就要实行共产主义，竭力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勃列日涅夫之流也攻击我们是“要树立分配中的极端平均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戳到了邓小平最痛的一根神经，勃列日涅夫的神经也立即颤抖惊跳，这大约也是那种“心波”在起着作用吧！

邓小平胡说“现在读书成了问题了”，攻击文艺革命是“一花独放”。勃列日涅夫之流也诋毁我们的教育革命是“倒退”，是“没有教育的教学”，文艺革命“毁灭中国的创作”。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使资产阶级失去了一块重要的世袭领地，邓小平当然要心火上升。这一来，又点起了勃列日涅夫的心头之火。你道这“传心术”灵也不灵？

邓小平要“全面整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心波”传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之流以为他的“健康力量”“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了。他们兴高采烈，做梦也在希望中国“回到现实主义政策和科学社会主义轨道”，回到同他们“友好和兄弟情谊道路上来”。他们把赌注押在“日益增长的反抗”上，再一次宣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公开叫嚷：“摆脱”无产阶级专政“束缚的时候到来”了。西方评论认为，克里姆林宫“相信”在中国存在一个“亲苏集团”，“作出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次起义的暗示”。于是，克里姆林宫发出的“心波”又回到邓小平罪恶的大脑瓜。果然，两个多月后，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小撮暴徒把勃列日涅夫的反革命愿望变成反革命行动，嚎叫“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不怕抛头洒血”，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纳吉。闹得最凶的那几天，苏修使馆的小汽车，日夜出没于广场，苏修记者亲临阵地，收集情报，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粉碎了邓小平一伙复辟翻案的迷梦。在天安门广场上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触即溃，顷刻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在邓小平身上，痛感的“心波”传到勃列日涅夫身上，勃列日涅夫那有不痛之理。人们都还记得，一九六七年一月，当邓小平第一次垮台时，苏修叛徒集团就曾经“深表同情”。这一回邓小平又垮了，这怎能不使勃列日涅夫“如丧考妣，昏迷苦闷”，惊呼“中国真正爱国者”要遭到“消灭”了呢！

苏联科学界喧嚣一时的“传心术”，并不是那些院士、教授们的新发明。在中国古代小说上，就有过多次记载。比如：老娘得了重病，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就会肚子痛。南方的妻子长相思，北方的丈夫就会做梦回到了家里。不过，这种“传心术”要有一个条件：“传心”的双方必须是母子、夫妻、兄弟这一类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邓、勃之间的“传心术”既然这样灵，他们又是什么关系呢？母子？夫妻？都不象。大约是兄弟吧。这个结论，不是毫无根据的。列宁就曾说过，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怎么办？》）邓、勃两位，正是这样一对难兄难弟。

“难兄难弟”一词的本意是，兄弟两人，志同道合，才德相当，不分高下。邓、勃二位“同”的又是什么“志”，“合”的又是什么“道”？他们同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之志，合的是搞“仙山琼阁”的假共产主义之道。勃列日涅夫之流不是称赞邓小平之流有“向往真正社会主义的正义愿望”吗？这种“真正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呢？邓小平在一九五八年对他的“真正社会主义”或曰“共产主义”作过这样的描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有高跟皮鞋、口红、电视机、冰箱，“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这种“真正

社会主义”，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理想，使邓、勃两位连上了家谱。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挂起的“假共产主义”招牌，对内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则是要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邓小平被勃列日涅夫吹捧为“真正爱国者”，就是因为邓小平是一个卖国主义者。别看他老是嚷着“起码要有爱国主义嘛”，实际上，此人历来鼓吹崇洋迷外，卖国投降，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于这样的“爱国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当然是心中有数的。难怪勃列日涅夫一再叫嚷：要在“可靠基础上”恢复“兄弟情谊”，共同走上“合作和团结的道路”呢！

毛主席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在背叛马列主义和干反革命事业上，从来是互相支持的。他们的爱与恨，他们的喜与忧，息息相通。邓小平想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向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寻找靠山，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把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变我国为他们的殖民地的希望，寄托在我国党内走资派身上。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难兄难弟”的“难”字，还有倒霉的意思。邓小平垮了台，勃列日涅夫只落得个“断肠人在天涯”，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传心”有术，复辟无门，悲夫！

孪生兄弟

——论邓小平和林彪——

舒浩晴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以反对林彪自居的。他在那份再次保证“永不翻案”的假检讨中，涕泪滂沱地控诉林彪要把他“置于死地”。以后，他在各种会议上，声称反对林彪的话更是不绝于口，大有深恶痛绝之势。

检验一个人能仅仅凭据他口头的声明吗？不能。最近，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

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打人，放火，砸车，无所不用其极，就把邓小平的真面目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反革命暴徒们恶语四溅，什么反对“秦皇”、反对“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啦，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不怕抛头洒血”啦，同林彪那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相比，真是思想象，语言也象。

口口声声“反对林彪”的邓小平，一步一步地踩着林彪的脚印走，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早有先例。考茨基不是曾经大骂过伯恩斯坦吗？然而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他同伯恩斯坦唱的是一个修正主义调子。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曾痛斥季诺维也夫是党内的右派，即半孟什维克；季诺维也夫也写了一大堆小册子谴责托洛茨基对党的进攻，甚至慷慨激昂地说过：“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后来，为了反对列宁主义的需要，他们互相实行“大赦”，撤销各自对对方的批评，结成了臭名昭著的“托季联盟”。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得好，季诺维也夫“昨天还大骂托洛茨基，而今天就和他接起吻来了”。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惯于演出这种昨天大骂、今天接吻的滑稽戏。林彪不是“大骂”过刘少奇吗？不是还危言耸听地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吗？可是《“571工程”纪要》则宣布，要对包括刘少奇一伙在内的所有反动分子“一律给以政治上的解放”，这不是“接起吻来了”？既然林彪能和刘少奇一伙接吻，那末曾经是刘少奇同伙的邓小平今天同林彪一伙接吻，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列宁说过：“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邓小平和林彪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一定路线的代表。他们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推行的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都是极右。他们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党内外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还要垂死挣扎，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邓小平就充当了他们的总代表。由于他和林彪代表着共同的阶级利益，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因此，“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如林彪路线是刘少奇路线的继续一样，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不能不是林彪路线的继续。革命人民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和刘少奇、林彪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

既然如此，邓小平“反林彪”岂不费解了吗？不。只要看看他的言论便可知道。他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从来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对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和谬论从来不

反。他“反”什么？反“极‘左’”。邓小平嘴里讲的“极‘左’”，有独特的含义，即文化大革命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带来的深刻变化。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极‘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是“极‘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极‘左’”……，总而言之，凡是革命的东西，站在极右立场上的邓小平都斥之为“极‘左’”。就象当年孔老二惊呼“礼崩乐坏”、彭德怀攻击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一样，邓小平眼睛里是一片乱、糟、偏，简直就象被挖了祖坟一样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办？就是要“扭”，给这一切都扣上一顶“林彪流毒”的帽子，然后挥起“整顿”的大棒，准备“名正言顺”地大杀大砍一番，耀武扬威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其实，把毛主席革命路线诬为“极‘左’”，也不是邓小平的新发明，《“571工程”纪要》里也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大反所谓林彪的“极‘左’”，这正暴露了他刮右倾翻案风，不仅是为自己翻案，也是为林彪翻案，为党的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翻案。

邓小平和林彪，毕竟有些不同之处。路线斗争的发展，总会随着时间、条件、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形式。如果说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利用了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突出的是靠“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来骗人的话，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更多的是利用了广大群众实现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两个宏伟目标、迫切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心情，高喊着“四个现代化”来贩卖修正主义黑货；林彪是躲在阴暗角落里拼凑反革命“联合舰队”、“小舰队”，邓小平则利用党落实干部政策的机会，明目张胆地拼凑“还乡团”。邓小平和林彪也有矛盾，但这是修正主义派别内部的矛盾，党内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要把彼此咬个粉碎，不可能象无产阶级那样团结一致。但是从阶级本质上说，他们又是殊途同归，在同无产阶级较量时必然沆瀣一气。

不是有人在谈到文艺作品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时，有点担心雷同化吗？请看邓小平和林彪，雷同吗？现实的斗争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千变万化。问题是我们要透过特殊性看到普遍性，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每经过一次激烈的斗争，我们对斗争规律的认识都会深化一步。所谓路线斗争“不可知”、“等通知”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每场重大斗争都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共同的规律性。怎么掌握它的规律？一是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一是研究现状，分析具体的特点。今后，这样的斗争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武器，懂得了斗争的规律，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和林彪殊途同归确实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二十年代莫斯科的红场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的莫斯科，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成百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行进在红场上和各条大街上，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在这一天，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分子也倾巢而出了。他们先是悄悄地溜到一些工厂，煽动工人上街呼喊反对派的口号，或叫他们干脆不去游行。游行一开始，他们索性跑到红场上及各条大街上，捣乱游行队伍，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到处挂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用极其狂妄的语言要捧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上台当“领袖”。一时间，红场上空翻起了滚滚的乌云。

反革命分子制造莫斯科红场事件是偶然的吗？决不是，它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和国际根源。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阶级继续遵照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这对于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来说，是欢欣鼓舞的，对于国内外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却无异于敲起了丧钟！于是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携起手来，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国内的富农、白匪和资本家则里应外合，从投机倒把、制造饥荒到破坏工厂，无恶不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向党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红场事件，就是在这种国内和国外、党内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发生的。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单方面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盟趁机加紧向党进攻，把所谓“八十三人的政纲”擅自发到党员中去。这个政纲反对党关于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决定，讥笑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要求把一批一批的工厂租让给外国人，讥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宣传工人阶级与农民必然会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同年十月，这个彻头彻尾的反列宁主义的政纲被理所当然地否决后，资产阶级便酝酿利用十月革命节的时机进行反革命闹事的阴谋。

从工人群众事后揭露的大量事实来看，资产阶级在红场事件中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是十分猖狂的。反革命暴徒的口号是：“把所有表示不满的非党人士都动员到游行队伍中来！”果然，在这面反革命的黑幡下，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和反对派分子麇集在一起了。许多自匪余党和资产阶级分子，还在筹划红场事件的时候就钻进了地下印刷厂，他们从《列宁格勒真理报》偷来铅字，印出了大量的反苏维埃传单。在

红场事件中，跳出来散发反动传单、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演说的，也主要是这些人 and 下层的反对派分子。他们的反革命劲头粗得很，你看：一个名叫阿里斯基的崩得分子（即反革命的犹太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站在莫斯科“巴黎饭店”的阳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反共演说；一些人极其疯狂地在许多楼房的墙上涂写反动漫画，把联共（布）党描绘成陷于重重枷锁而找不到出路的囚徒。每当工人队伍在游行中高呼“列宁的党中央万岁”的口号时，这帮暴徒就伙同大街上的流氓阿飞起哄，骂下流话，呼喊反动口号。这些反动家伙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简直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事实再次印证了列宁指出的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反对派小喽罗盖欣在煽动暴徒们时恬不知耻地说过：“你们可以带着妻子一起去参加游行，要是没有妻子，就带着情人，带着孩子，带上母亲、父亲”。这种不惜老本、决一死战的狂妄语言，充分地表现出被击败了资产阶级的“增长了千百倍”的反抗劲头。

红场事件，给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都提供了表演亮相的机会，包括那些钻在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整个红场事件不是明目张胆地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受批判翻案吗？反革命暴徒不是呼喊出象“世界领袖——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万岁”之类极其无耻的口号吗？事实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流就是红场事件的总后台。正是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四方，到处兜售反党的“八十三人的政纲”，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煽动党员把党证扔掉、撕掉，分裂布尔什维克的党。也正是他们，幕后操纵还不过瘾，终于不惜赤膊上阵，亲自动手。盖欣煽动暴徒上街的那个反革命动员会，就是在托季联盟头子之一的叶弗道基莫夫家里举行的。地下印刷厂炮制的反革命传单上，都赫然地印上了托洛茨基等人的签名。包括红场事件中用以招徕信徒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所谓“领袖像”，有几幅也正是这些“领袖”本人自己动手挂在自己住宅的临街窗户外面的。从反革命暴徒死保机会主义头子的一出趣闻上，更是可以看出后者在反革命棋盘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当时游行参加者揭发：当游行队伍中的工人同志看到一幢大楼的四楼上悬挂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时，就要攀上去扯掉，这时，只见“有个人从房顶上，弯着腰，冒着掉下来的危险，放下一根铁丝钩”，要把自己的坏头头的画像护住，而另外一个暴徒也冒着危险，象“耍杂技”似的悬在四楼的窗口外密切配合。反革命暴徒死心塌地地保党内走资派，恰恰说明党内走资派是革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正如联共（布）中央为红场事件作出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次明显发展为反对苏维埃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反党活动的主要领导人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红场事件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党内走资派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牛鬼蛇神，总是要联成一气的。对于那些反对共产党领导、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打、砸、抢以及各种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然而，“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象托洛茨基那样的党内走资派，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蛇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这不仅因为他们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因为在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

很臭的情况下，这些人打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旗号，比较容易蒙蔽人们，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名义的情况下复辟资本主义。这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党内走资派还以自己在红场事件中的活动，显示出他们总要交替地使用各种反革命手法的。当着机会主义头子自认为搞复辟的把握很大的时候，资本主义复辟会采取和平演变的形式。托季联盟的头子在红场事件之前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一旦反革命的和平演变受到阻遏时，党内走资派就会狗急跳墙，采取激烈的形式，露出张牙舞爪的法西斯嘴脸。托季联盟为什么急于制造红场事件？这应当联系事件之前一个月全党对“八十人的政纲”的投票来考察。投票结果：赞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名，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名，不满百分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季联盟铤而走险，红场事件应运而生。列宁说：“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在平时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以后怎么办？》）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红场事件还告诉我们，党内走资派狗急跳墙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他们策划的闹事活动吓不倒革命人民，相反，这一闹，就在人民面前剥下了自己的伪装而陷于极其孤立的境地。苏联的工人群众愤怒地指斥反革命闹事的目的是“为苏哈列夫卡效劳”——苏哈列夫卡，那不就意味着让劳动人民重受商人和资本家的欺压？岂能允许！于是，在莫斯科“巴黎饭店”阳台上发表反动演说的暴徒，得到的是“一阵愤怒的吼声”，“紧接着阳台下飞来了苹果和套鞋”。到工厂去点火煽动的反对派分子，受到工人的严正指责。连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季诺维也夫等头目，也是靠着民警的帮助，才将他们从愤怒的游行参加者手中拖出来。当时的《真理报》给反革命分子制造红场事件的评语是：“一无所得”。这也不奇怪，右派政变总归“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正是过去的红场事件和今日的天安门事件一无所得、一触即溃的根本原因。当然，“得”，也是有的，那就是属于革命人民。英勇的苏联工人阶级正是从红场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益，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尔后的斗争中一次次战胜了托季联盟的反扑，最终把它们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然而，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永远也不要忘记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红场事件是过去了，但红场事件所证明的历史经验却是不能丝毫淡忘的。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忘记了这一点而遭致的流血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中，联系天安门广场事件，重温五十年前的红场事件的历史，必将可以使我们提高跟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自觉性，进一步认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从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到底。

朝阳农学院学习散记

上海赴朝阳农学院参观学习小组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高潮中，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三日，我们到朝阳农学院进行了参观学习。十天中，我们同朝农的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狠狠回击右倾翻案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

战友相逢分外亲

“见到你们亲哪！咱们虽然远隔千里，心是连在一起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咱们连在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咱们又坐到一起了。咱们是一家人呵！”“王大学”王贵彬的这一段话，说出了我们的亲身感受。在批邓斗争中，战友相逢了，怎么不倍感亲切呢！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去年五月，朝农同志来上海交流教育革命经验的情景。那时，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毛主席“七·二一”光辉指示，恶毒攻击上海机床厂道路“只是个形式”，妄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朝农党委书记徐明同志，在上海机床厂全厂大会上，代表朝农的师生，热情而坚决地支持了七·二一大学，使全厂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的鼓舞。徐明、王贵彬、陈天凤三位同志，还向上海教育战线的同志们介绍了朝农的新鲜经验，激励大家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革命到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朝农的同志们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正因为朝农实践和捍卫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因而在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所受到的攻击特别多，压力特别大。根据朝农同志们的揭发，光邓小平和教育界的走资派指名攻击朝农的言论，就有二十几条。什么“与十七年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呀，什么“社来社去，大学就不要办了”呀，什么“三年普及大寨县，象朝农水平平行吗？”什么“朝农尽搞新花样，闹得全国都不得安宁”！有人甚至扬言要追朝农的“后台”，大整黑材料。刹时间，黑云压城，阴风阵阵，大有刮平鹰嘴山，把朝农从地球上消灭

之势。

但是，鹰嘴山是刮不平的，朝阳农学院也是骂不倒的。朝阳师生有一句战斗口号：“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朝农党委举办有三百多人参加的校系两级干部和教师、学员骨干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家越学越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决心用实际行动，同资产阶级的这些攻击对着干。

他们的斗争，得到了上级党委的坚决支持。辽宁省委的领导同志响亮地回答：“他们要追后台，我们就是朝农的后台！”支持朝农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全国革命人民。邓小平看似气势汹汹，不过是小丑跳梁，不堪一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鹰嘴山怒吼了，大凌河沸腾了，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熊熊地燃烧在朝农每一个办学基地和每一个科教点。

我们深深为朝农战友的战斗精神所感动。正是由于朝农战友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所以就能发扬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坚决顶住了邓小平的攻击，为我们提供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新鲜经验。

当我们把这个感受告诉徐明同志时，他谦虚地笑了。他说，朝农的斗争是和清华发生的斗争，和全国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朝农得到了北京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其中也包括上海工人阶级的支援。你们这次来，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我们。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呼呼的。朝农战友的批邓战斗大大激发了我们的革命激情。应朝农战友的邀请，上海机床厂的三位同志连续三次向朝农师生、朝阳地区的干部、群众和驻军以及各地来朝阳学习的同志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体会，共同批判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批邓的吼声，汇成了大海的怒涛，这不正是全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一个缩影吗？

女“王大学”的故事

女“王大学”，名叫王凤兰，今年三十九岁，原先是赤峰市城郊公社永胜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现在是朝农农学系二年级学员。在朝农的创业滩工地上，她给我们讲述了她上大学的过程：

“解放后，我只上过小学，中学就没念成。因为在考中学时，硬是以一分之差，将我刷了下来。资产阶级分数线真狠呵，我那时是夏天上学，冬天跟父亲种地，实际上只念了四年书，哪有时间去背那些本本呢？再说，他们为什么不考考如何种地呢？‘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多虚伪啊！”

“中学没考上，我就回家种地。文化大革命中，我接触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去年一月学习了朝农经验，看到五十多岁的王贵彬同志，受阶级的委托上了大学，我的心就热起来了。我想，我比他还年青呐，虽说他是个男同志，但女同志咋不行啦？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我提起笔打算给朝农写信，又有点犹豫了。说穿讲吧，自己有点留恋那个‘大瓦房、小当院，几口人、四大件’的小家庭。我们大队是蔬菜队，条件比较好，平均日值一元五角，我每年四千七百工分，合人民币七百元左右，如果进了朝农，那这三年两千多元就没了。”

“正在这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了。我想起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我半个家，我六岁那年，因为家里穷，母亲得病没钱治，死了，十六岁的大姐换了粮食，二姐十一岁时，活活饿死了，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人。现在，家庭生活好了，我留恋小家庭，这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朝农的大学生，‘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我呀，也得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象一个朝农的大学生！我越学越觉得我这个大学非上不可了。我说：什么三年两千块，见你的鬼去吧，我算和你决裂啦！于是，利用一个星期天，写了那封信。”

“发信后的第六天，我到赤峰市一所中学讲农业八字宪法课，刚讲完，我的二孩子跑来说：‘妈，朝农来人了，在家等你哪！’我一听，乐坏了，踏着脚踏车，飞也似的赶回来。”

“农学院派来的小张和公社的一个同志已在家里等我很久了。小张说：‘朝农比赤峰艰苦，你考虑过吗？’”

“我说：‘认真考虑过了，你放心吧！’”

“我把我为什么要上学的思想动机，原原本本的向小张说了。还开了个家庭会，我爱人，我孩子，都支持我去。小张看见我态度坚决，最后说：‘这样吧，你准备一下行李，我先回去汇报，你随后自己坐火车来。’我一听，赶紧一把拉住小张，说：‘不啦，咱就一块走吧！’”

“小张同意了。她陪我到医院检查体格。医生并不知道我是作入学前体格检查，当我站在X光机上透视肺部时，他在镜子后面东瞧西瞧地问：‘你有什么病？哪里不舒服了？’我说：‘我没病，也不觉得哪里不舒服。’他以为我开他玩笑，有点生气地说：‘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大声说：‘我呀，要上大学了！’他一听，镜子也不看了，拉亮了电灯，仔仔细细地打量我，许多人也好奇地围了上来。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句：这样大年纪的女同志上大学，真是新鲜事儿呵！不成了女‘上大学’吗？”

“是新鲜事儿呵，我临走时，公社为我开了欢送大会。贫下中农也高兴呵，因为我上的是朝农，送得去，回得来嘛！”

“院领导还怕我对上朝农的思想基础不牢固，说再给我三天时间考虑。我说，你这三天就得了吧，你们就考验我三年吧！我上朝农一不是想捞个铁饭碗，二不是图名和利，我是来朝农学习马列的，是学习好后回去大干社会主义的，你们就一千个放心吧！徐明同志”

听我这样说，笑了，说：“行，你是咱朝农的大学生了，明天就可以上课了。”就这样，我这个大学生已经当了两年了。”

听完了女“王大学”的介绍，我们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想起了徐明同志的一番话：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我们朝农搞社来社去将招不到学生，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当然喽，他们这些‘望子成龙’的大官们，是不肯把子女送来的，咱朝农也不是为他们这号人办的！但是，铁心务农、誓为缩小三大差别作出贡献的人，何止上千上万呵！对他们，咱们朝农不是招不来，而是装不下啊！”

访一个教师的家

农学系教师陈天凤和我们是熟人了。

一天，我们上她家去串门。不巧，屋内只有两个小孩。从孩子的口中我们知道，男孩叫吴凯，读初中了，女孩叫吴宇红，刚进小学。妈妈和在水利系当教师的爸爸，都到科教点去了，今晚不回来。平时，由于父母常到农村去，孩子们一直是自己料理生活的。

“你们会做些什么家务？”我们感兴趣地问。

“我会买煤、挑水、做饭。”男孩淳厚地答道。

“我会扫地、喂鸡、洗衣服。”女孩天真地说。

“她还会拾粪！”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一个与吴宇红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抢着插嘴说。

“真的？”

“可不是嘛！”小姑娘一个劲地说下去：“打腊月来，她已为集体拾了九百多斤粪呐。”

九百多斤？我们简直有些不相信。就是大人也不容易哇；我们问：“这九百斤粪你咋拾的？”

小宇红抬起头来，水灵灵的眸子瞪着我们，神情严肃地说：“用粪丫子，天天去拾。”

望着这七、八岁的女孩，我们想到，多少年来，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中，孩子从小受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熏陶。可如今，这个风气在朝农的教师家庭中变了。我们记得，陈天凤在上海时曾和我们讲过，一九七〇年她为了方便给贫下中农送教上门，曾经把孩子放在贫下中农家里。当时，小宇红才两岁。随着知识分子的妈妈身上贫下中农的感情增加，这个知识分子的孩子也学到了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品质了。朝农的教育革命，不仅深入到社会，也深入到家庭中了。

过了几天，陈天凤回来了。当我们把这个感受告诉她时，她不介意地一笑：“咱朝农职工家的孩子都这样，并不是我的孩子特别能干。”停了停，她又感情深切地说：“再说，孩子能这样，也是我这个妈妈受到贫下中农教育的结果呵！”

接着，她向我们讲述了在生活道路上的一些往事。

那时，感到在旧沈农当教师挺惬意，既不用下农村，又不搞坐班制，每星期教完几节课，就上图书馆，抓抓外文，写些文章。生活上也挺舒适，住的是高楼，吃的是细粮，夫妻俩工资一百多元，日子过得很顺畅。一晃就是十多年。

文化大革命的春雷，摧毁了旧沈农贯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院从沈阳搬到了朝阳的山沟。这可触到了陈天凤的灵魂。

以前，她在旧沈农教的是玉米课，也讲过如何施肥，但自己却从来没动过手。看见社员掏粪，就赶紧躲得远远的。而现在，得动手干。这是一种大粪和棉籽饼一起发酵的拌肥，要用手抓起来，撒在地里。望着这又臭又脏的粪肥，她的手怎么也抓不下去，心想：回去得洗多少次肥皂呵，怎么做饭呵……

“后来呢？”我们问。我们想起了在朝农展览会看见过的一张照片，那是在阳光下，陈天凤和一群女教师正在热气腾腾地掏粪积肥，旁边有一首诗：“过去见粪烦死人，如今见粪亲又亲，不是大粪变了质，毛泽东思想育新人。”从“烦死人”到“亲又亲”，这个变化有多大！

“那是在农村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山村中有的十七八岁的闺女还是文盲。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呵。我这个大学教师，吃她们种的粮，穿她们种的棉，却不为她们服务，多可耻呵！于是，在院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办起了‘腿肚子’大学，给贫下中农送教上门。

“一天晚上，我和另外一个教师，约定给一个大队的贫下中农讲课，不料临时下起了大雪。山高沟深，我们猜想贫下中农可能不会来了，但为了不失约，我们还是去了。当我们走进大队时，贫下中农老老小小已坐满一屋子了。讲完了课，贫下中农握住我的手，说：‘你们听毛主席的话，把农大办到咱家门口，太好了！’当时我感到象有股热流直涌全身。这种感情交流，我在旧沈农是没有体验过的！农大办在城里是见鬼，搬到农村，办在贫下中农中间，才见到了太阳！

“渐渐地，我感到自己过去那些轻视农民、厌恶农村的思想是最臭的了，自己过去在旧沈农习惯的那套知识分子生活习惯是最脏的了。而贫下中农虽然脚上沾有马粪，但最干净的是他们。从此，我努力向贫下中农靠近，再也不觉得农村的生活艰苦了。”

“也更象一个农民了。”我们笑着说。可不是，从外表上，陈天凤顶象个朴实的北方农村妇女。有过这样的一件小事：去年秋天，陈天凤和刚入学的新学员劳动时，有个学员咕咚：“怎么搞的，教师不来劳动。”过了几天，当陈天凤走上讲台，这个学员才恍然大悟：“哎呀，原来你就是教师呵！”

“光外表上象农民可不行呢”，陈天凤笑了笑，“得在世界观改造上下功夫。邓小平装出一副关心我们知识分子的样子，说什么改造过头了。这是妄图使我们走十七年的老路！这几年，我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的世界观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不改造，就会成为邓小平一

类的社会基础。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改造世界观的步伐得加紧,得加快啊……”

朝阳地区朝农化

“朝阳地区有多大,朝阳农学院也就有多大!”当我们坐上汽车在朝阳山区奔驰,到处可以见到朝农师生战天斗地,开展教学活动,我们就想,朝农可真大呵。当我们来到展览会,看见地图上标志着朝农的办学基地、科教点、试验站的红点,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朝阳地区的六个县的社、队里,我们又想,朝农可真大呵。但是,经过十天的参观学习,我们才觉得,光从地域上来认识朝农之大,那可太肤浅了。

在木头城子公社,我们参观了公社办的一所五·七中学。除这里的总校外,还有四所分校,设有理论、农业、水电、木工、赤脚医生、革命文艺等十一个专业。六年来,为各大队输送了四届毕业生二百九十七名;还有短训班、巡回班,为社、队培训了八百五十多人。

这所学校,可以说是朝农的一个缩影。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人们看来,这确实不象个学校,这里听不到什么琅琅书声,却到处洋溢着革命大批判的怒吼声,劳动的号子声,小型机械的轰鸣声,这是一所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亦工亦农亦学的新型学校。

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学校党支部书记赵光辉同志,今天挤出时间来陪同我们参观。机会难得,我们便请他谈谈办教育的体会。老赵毫不推辞地说开了——

“说起办教育,我可确实是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所说的那种‘外行’。我自己就没有进过学校。我一直是抓农业生产的。前几年,公社党委决定我兼管这所学校,我还不大通呢。心想,管生产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管教育啊。但是,想到毛主席说过,党委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我还是管起来了。”

“领会毛主席这一思想还是有个过程的。有件事对我教育特别深。那是在几年前,在全公社范围发现了虫灾。我们公社有一个农科站,总共只有三个人,而全公社就有十五个大队。虫情又急,怎么忙得过来呢?可我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三个人找来,叫他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把治虫办法传达给所有生产队。不想到了学校,这帮孩子给我出了好主意啦。”

“我一进屋,孩子们就围了上来:‘书记,你干吗,愁眉苦脸的?’”

“我说,‘你们不晓得地里有虫吗?’”

“‘咱早知道啦,你打算怎么办?’”

“‘人手少,农科站才三个人,只能拚命去跑罗。’”

“‘嘿,咱不是人吗?’”

“‘你——’我楞了。”

“孩子们这才对我说:‘咱们想,请农科站来给咱上一课,这个虫怎么治,咱不也可以一

起去跑吗?’

“我一听可乐了，好主意！就按着孩子们的建议，马上讲课，讲完了就下去。不到几天，虫就治住了。

“打那时，我才想到，教育可真管用。咱公社在山沟沟里，条件差，要学大寨，要搞机械化，得有一大批农机手、水电员、赤脚医生，哪儿来？咱还得自力更生，自己培养，办五·七中学可是个好途径哪。”

老赵停了一停，又说下去：

“不过，当时咱想到的还只是生产、技术。打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后，我才想到，生产技术当然得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占领农村的一切阵地。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中的落后思想我是很了解的，‘四间瓦房一个院，儿孙满堂守老伴，喝水吃菜不出院’，靠这种思想怎干得了共产主义？”

“这样，咱办教育的目的就更明确了。你们刚才看到，咱这里有个木工班。为什么要办这个班？就是要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就是要剥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技术垄断。咱还搞了理论班，学生学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回生产队后再办政治夜校，象滚雪球一样。咱通过这个五·七学校，全公社层层办学，就可以做到使广大贫下中农人人都在组织之中，人人都受到教育。”

赵光辉同志的介绍，真使我们每个人都大开了眼界。在朝阳地区，这类学校正在遍地开花。除了朝农之外，各县都办起了五·七农大，公社办起了业余农大、五·七中学、政治夜校，大队办起了五·七小学，形成了地、县、公社、大队四级科教网。议论着这种生气勃勃的景象，我们一个同志脱口而出：

“这可真是朝阳地区朝农化呵！”

朝农大吗？可真大。大就大在朝农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正在深入社会，深入到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学校，成了各级党委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地，正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威力。正如朝阳地委书记王吉道同志所说：“全地区三百万贫下中农应该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教育者，八百万亩土地都是大办教育的课堂，整个地区的山山水水都是教育革命的战场。”整个朝阳地区就是这样一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十天的参观学习是短暂的。但是，朝农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先进经验已经深深地扎进了我们每个同志的心坎里。我们决心向朝农学习，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狠狠反击右倾翻案风，夺取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广阔天地新大学

——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函授大学

上海市教育局函授组

一九七四年春天，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一所新型的业余函授大学诞生了。

这是一所为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的新型大学。上海十六所高等院校参加了办学工作，得到了各地党委的支持。几年来，这所大学的办学点从安徽、江西、黑龙江、吉林和云南五省的六个地区三十八县，逐步扩大到十二个地区七十九个县，招收了近九万名学员。这所新型大学的诞生和成长，从各个方面猛烈冲击和限制着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了上山下乡的胜利成果，以铁的事实批判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恶毒攻击。

(一)

这种新型的大学，培养的是和工人农民划等号的大学生，拆掉了“读书做官”的梯子，堵塞了精神贵族的道路。函授学员人不离农村，身不离劳动，心不离贫下中农，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学员在学习期间既是社员又是学员，毕业后连张证书也不要。

贫下中农非常热爱这样的大学。他们说：“从来上大学都是农村往城里跑；如今，函授大学办到农村、山沟，培养的是咱自己的大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阜阳有个公社曾经送过两个青年到城里医科学校进行培训，毕业回公社却向贫下中农伸手要待遇，扬言读了这几年书不给我多少元一月的报酬，我不干了。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哪里象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呀！真叫是：“一等，二盼，三落空。”函授大学办了两年，光阜阳县新华公社一地，就培养了理论、农机、农技、医疗各种人材六百二十名，这才是：“一办、二千、三落实”！

广大知识青年更是热烈欢迎。他们下乡七、八年，和贫下中农共同战斗，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希望既能坚持乡村，又有机会学习理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作贡献。如今大学办到了农村，办到了知识青年的家门口，怎能不使他们欢欣鼓舞呢？他们亲切地称呼它是“扎根大学”，是“广阔天地新大学”！井冈山弹前公社上洛农场小陈等几位知识青年，为了掌握变化多端的山区气候，更好为农业生产服

务，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气象哨，但是由于缺少气象知识，往往报得不准。《气象》函授办起来，正如雪中送炭。去年四、五月连续暴雨，赣水猛涨，小陈他们为了及时赶到县里参加学习班，连续四天，沿着赣江来回走了二百多里路，翻过人迹稀少的阿弥陀佛山，赶上办班；学了回去更是坚持自学，勤观察，勤测报，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去年八月，气象小组从观察仪表和从动物一些反常现象，预测到三号台风即将过境，并有暴雨。第二天果然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雨，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有了准备，全公社没有遭到损失。

知识青年通过在这所大学里学习，更加坚定了坚持乡村，誓当一代新农民的决心。安徽蒙城朱集大队知识青年王东风，参加了业余函授大学的学习，在贫下中农指导下为大队修建了小型电灌站，在村北的河道里建成了拦水坝，越干越舍不得离开农村。他向来爱好美术，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使他放弃了去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机会。他说：“大队的水利、土地和道路规划才开头，电灌站正在修建，我怎能离开呵！”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大学，他回答说：“我参加过上海机械学院的《农村电工》短训班，又参加了同济大学的《农田水利工程》函授班，农村也是大学，我不是已经上了大学了？”

知识青年经过学习，增强了同“知识私有”等陈腐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自觉性。贫下中农派他们上大学，学到了知识本领就用来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吉林省琿春县有个大队，合作医疗办了三次，但由于请来的大夫搞技术垄断，盘剥贫下中农，结果三次都垮了。上海中医学院的函授办到了他们那里，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选派了知识青年童国伟去参加短训班，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为革命刻苦学习。一年多光景，他掌握了一百三十多个常用针灸穴位和推拿的基本方法，又能识别一百多种中草药，采集了上千斤中草药，搜集了四十多种验方、土方。他凭着一双手、一根针、一把草，怀着一颗红心，走遍了大队的家家户户，巡回二千多里，医治病人二千九百多人次。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病痛，小童还在自己身上试着扎针，并且冒着危险试服有毒的草药。一年中，小童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二十天，上山采药六十天，加工药材三十天，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

函授大学就这样培养了一大批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的大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政治科目学员两万多名，成为农村一支理论骨干队伍；《写作》学员一万多名，拿起笔作刀枪，运用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和广播战斗在农村各条战线；《农村常见病防治》学员一万多名，有的成了赤脚医生，有的担任了卫生员；参加农业技术科目的学员四万多名，充实了各地四级农技网，形成了一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生力军。他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大显身手。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说什么：“大学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对大学培养劳动者横加指责。那么就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吧，函授大学培养的与劳动者划等号的大学生怎样一反旧大学生那副“高贵者”的姿态，生气勃勃地活跃在三大革命第一线。这批新型大学生，他们上大学，既不为文凭资格，又不为工资级别。他们正在实践着“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巴黎公社原则，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最前列。

(二)

函授大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广阔天地为课堂，师生边学习，边实践，边战斗，坚持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办学。

函授大学办到了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使教育和农村的斗争息息相通。复旦大学举办的《政治经济学》科目，每到一地办学，总是遵照当地各级党委的意图，先作调查研究，了解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讲课时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次在一个县里，有的学员听了课，连夜回到生产队和队干部研究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迫切问题。镇上有的搞投机倒把的人知道后，心惊肉跳，半夜三更来敲门问：“你们讲的是不是我们的事呀！”县委领导同志说：“这样讲课触及时事，很解决问题。”广大函授学员带着现实斗争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学习，从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分清了是非。云南橄榄坝农场五分场政治函授学习小组，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时，分析了在办农场路线上存在的“定额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流毒，一致表示：“要做边疆建设的主人，不做定额的奴隶。”他们在党组织领导下，发扬共产主义劳动精神，用实际行动批判了修正主义办场路线，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这里，教育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广大函授学员，同社员同流一身汗，同滚一身泥。生产斗争中提出的问题，就是他们学习的课题，贫下中农关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研究的项目。《育种》、《植保》、《化肥》等，按照农时季节，确定教学内容。比如，在早稻育秧时，他们就学浸种，催芽；六月份早稻孕穗期间，就学习水稻的形态、生长和发育；水稻扬花，就讲杂交、育种。水稻成熟时，就学系统选优、品种鉴定。九月份是水稻病虫害容易发生的季节，就着重学习虫情测报和防病灭病的知识。江西余江县石港公社的《植保》函授学员李宝弟，七月骄阳似火，他整天背着三十多斤重的喷雾器在烈日下为消灭稻田病虫害而奋斗。晚稻田里发现了枯心苗，打了药水效果不大，李宝弟把这个问题作为植保学习的课题，在劳动中细观察，勤研究，同时认真学习植保手册，仔细查阅资料，虚心向贫下中农请教，终于掌握了害虫的生活规律，采取了有效措施，使晚稻白穗率控制到百分之一以下，生产队粮食比前年增产一万余斤。

由于坚持紧密联系实际，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学习，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安徽亳县立德公社五七农机修配厂，就是施本志等八个知识青年在与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原先，他们插队在一个公社，参加了交通大学举办的《农用柴油机》短训班后，他们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运用学到的农机维修技术，和那些“有酒有肉跑得快，没酒没肉推称车子坏”的人对着干，不计报酬，不辞劳苦，自带干粮，随叫随到。他们还还为公社培训了二百六十名农机手，帮助十四个大队组织五七农机修配小组，组成了农机修配网。这个修配厂既是公社农机修配中心，也是函授大学农机班教学基地，更是发扬新风尚，抵制资产风的社会主义阵地。象这样的“五七”修配小组，“五七”医疗小组，“五七”电工小组，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有。

这种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劳动实践的学习，正如贫下中农普遍反映：“学得进，用得上，见效快”。西双版纳的《橡胶栽培》学员在劳动中反复研究，使接芽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被称为“科学实验的闯将”；井冈山的《气象》学员，为革命识天气，为增产办气象，使气象预报准确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被誉为“农业生产的好参谋”；上海第一医学院在江西婺源调查了解农村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方面需要药物和当地药源状况，举办两期制药短训班，帮助学员学会制“半边莲眼药水”、“山蜡梅冲剂”、“蛇药冲剂”、“四季青注射液”等十三个品种的中草药针剂和冲剂，共四千三百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教育革命，叫嚷得最厉害的就是所谓“质量”问题，污蔑现在的大学生“质量差”，“水平低”。在函授大学里一大批能文能武的学员正在为农业学大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给邓小平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

“书记挂帅，群众办学”是这所新型大学的另一个特点，保证了教育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各地党委把办好函授教育看作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大事。他们不仅把函授教育列入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之中，还发动各个部门共同关心和支持这所新大学的成长。安徽阜阳地委，不断提高对函授教育的认识，出现了“书记亲自抓，分管领导主动抓，有关部门配合抓，知青办和教育部门具体抓”的动人情景。地区水利局领导十分重视函授大学，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函授教育的意义和任务，还派辅导教师参加县里的短训班。他们发现同济大学原来办的农田灌溉工程科目，不能满足农田水利的要求，就和教师共同研究，将原来这个科目改为农田水利科目，包括社队的农田基本规划、简易测量、小型桥梁、涵洞、排灌工程等内容，使教学能更好地适应为农村培养水利人材的要求。

公社，是函授教育的一个基层单位。在已开办函授教育的二千多个公社中，就有二千多个辅导组在关心着九万多名知识青年的学习。黑龙江呼玛县欧浦公社有一百四十多名知识青年参加函授学习，党委按照青年参加的不同科目，编好学习小组，委派兼职教师，确定实习场所，积极组织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公社党委书记有次下乡，了解到怀柔的电工学员想自办小水电站，他对于学员这种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给了热情的支持。缺少材料，他亲自帮助解决，还派了一位公社副主任去直接支持，在上海师大电工教师的协助下，经过二十多天的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一座十瓩土发电设备，解决了农村生产队照明、磨面等用电问题。公社并召开了现场会在各个生产队作了推广。

函授大学还有着一支八千余名工人、贫下中农、干部、拖拉机手、医生、教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强烈的阶级感情，热情地关心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一代人的成长。安徽固镇刘集公社农技站苗云峰同志，在一九七五年担任

了育种科目的兼职教师，始终把辅导函授大学的二十四名学员挂在心上。他发现个别生产队对学员参加函授支持不力，就去找队长谈心，宣传办好函授大学的意义。老苗还经常组织学员交流思想和学习体会，发现哪个学员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哪个队的科学实验上有困难，就骑上自行车遍访学员，上门解决，有力地支持了函授学员的学习和工作。

贫下中农更是把函授教育挂在心上。办短训班，贫下中农赶着大车、驾着拖拉机送学员去参加；在面授时，老贫农走上讲台进行忆苦思甜；学员进行社会调查，贫下中农积极提供情况；办小气象哨，贫下中农主动介绍看天经验和农谚，向青年提供“情报”。在生活上，有的主动腾出暖炕、竹楼给学员住；有的把自腌的咸菜送到学习班；少数民族老大娘还热情地为青年做饭、煮水。

还有上海派往各地的学习慰问团员，对函授教育事业倾注着无限的热情，他们既是知识青年的贴心人，也是函授大学的热心人。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广大函授学员正在党的关怀下，贫下中农的直接辅导下，为革命而发奋学习。这样一种欣欣向荣景象，岂是那些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的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所能想象的！

(四)

城市大学为农村办函授，反过来又推动了学校的教育革命。

开始办函授的时候，学校有些同志认为“教育革命那么忙，哪有精力搞函授”，有的认为专业不对口，工科大学说自己“姓工不姓农”，文科又说自己“没有精力搞普及”，也有些人认为搞函授是“小儿科”。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以来，各校的同志学习了朝阳农学院的经验，认识到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校，应该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大家算了一笔账：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仅上海一地就有上百万。他们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的第一线，迫切希望继续学习，但上海大学普通班每年招生至多一万余人，学校应该为广大坚持在农村的青年着想，帮助他们，为农业作贡献。他们说，所谓专业对口，看对什么口，对旧大学的口，还是对三大革命斗争需要的口，这实际上是一个“谁适应谁”的问题。大家认识到办函授教育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份内事。

有了这样的认识，各校组织干部和教师下农村调查，农村急需而大学原先没有的科目，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办，教师原来不熟悉的就自己先学起来，没有教材就动手编。化工、科大等校的化学教师了解到农业生产急需化肥而帝修反抬高价格来卡我们的情况，急贫下中农所急，在江西、黑龙江等地办起了《腐植酸肥料》，他们带着学员爬山涉水，找寻矿源，自制土化肥，培养了一支土化肥队伍，促进了农业增产；交通大学原来搞万匹机的教师开设了十几匹马力的农用柴油机函授，纺织学院搞化纤的教师主动承办《农村应用化学》，海运学院的教师开设了《农村会计》，同济大学水暖系和路桥系合起来办了《农田水利》等

等,开设了基本适应农村需要的二十五个函授科目。

送学上门、送教下乡,促进了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教师到农村接触沸腾的实际斗争生活,置身于工农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时刻能受到教育。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斗争中以农为荣、以苦为乐的崇高思想境界,鼓舞了广大函授教师的革命热情,批判了自己头脑中各种旧观念,涌现了很多先进事迹。在反修前哨爱辉县举办《俄语》函授的几位女教师,年龄虽然都已四十开外,但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录音机,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从一个队到一个队地送学上门,即使是只有一个学员的山区大队,也坚持把教学送上门去。她们一到知识青年家里,帮着洗衣、补裤、做饭、烧炕,与青年促膝谈心。贫下中农见了,就对知识青年说:“上海妈妈来了。”

坚持送学上门、送教下乡,进一步沟通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上海师大地理系原来讲气象课总要从地球概论讲起,烦琐得很。现在他们从函授中得到启发,改革了原来那套教学方法,从看云识天、气象预报入门讲清理论,培养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学校的物理系,在大跃进时期曾经研究过异步电动机的发电问题,后来被一些人认为“不正规”砍掉了,这次搞函授,看到在农村不少地方正是这种“不正规”的发电机解决了贫下中农的用电需要,他们就把这些异步电动机发电和山区农村小型水电站等群众性的经验汇编成教材,带回学校在普通班中使用,促进了学校的教育革命。

函授教育给上海的医学院校的教学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上海第二医学院开展函授教育,使这个医学院派往外地的医疗队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医教结合形式——医教队。它工作的内容更为丰富,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既治病,又育人,做到“医”和“教”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在医教队里不少基础理论课的教师迅速改变“医生的老师不会看病”的怪事,搞临床的同志也打破机械分工的界限,朝着又红又专、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两年来,他们在淮北农村为贫下中农治病二万五千余人次,还培养了三千六百多个函授学员。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当了赤脚医生,其余大多担任了生产队卫生员,建立了一支永不撤走的医疗队。

函授教育的不断深入,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需要,大大激发了高校教育革命的热情。许多学校急贫下中农所急,积极地为当地培训函授辅导教师。今年,已有十二所大学办了《政治》、《植保》、《农机》、《医科》等十二个专业,十六个“函授辅导教师培训班”,招收了五百多名函授学员,这些培训班有的在上海办,有的在农村办,有上有下,毕业以后都回到农村中去。上海高校建立起一批在各地招生的“社来社去”专业,大大加速了学习朝农经验的步伐。

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灿烂的图景。函授教育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支生机勃勃的新事物的幼苗正在茁壮地成长,朝着《五·七指示》指引的光辉前景大步迈进!

说古道今批洋奴

——江南造船厂一个退休老工人的口述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我们厂里有的工人师傅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那一套，同当年李鸿章、蒋介石搞的没有什么两样，应当狠狠地揭露批判。我们几个青年人，进厂不久，不了解历史，大伙一合计，想起了小江的祖父江师傅。

江师傅是个退休老工人，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我们去找他，他正戴着老花眼镜在学习报上最近发表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我们告诉他，党内那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在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坏我们造船工人为社会主义祖国铺设“海上铁路”。这时，只见江师傅绷紧了脸，两眼放射出愤怒的光芒。他沉思了一会儿，就对我们说开了：

我在旧社会做了几十年工。从清朝的江南制造局，到国民党的江南造船所，直到我们自己的江南造船厂，我都做过。要说洋奴，听到的，见到的，三天也说不完。你们青年人不清楚，我就对你们讲讲吧。

从“保民”轮开倒车谈起

我这一家，祖祖辈辈都是造船工人。从我爷爷到才进江南厂当艺徒一年半的孙子力生，经手造的船确实不少。记得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造过一艘“保民”号兵轮。那时，我爷爷正在江南制造局轮机厂做机匠。他和他的师兄弟都参加“保民”轮的施工。这个江南制造局名义上是清政府办的，实际上是洋人的天下。总办叫邵友濂，会办叫倪人涵，都是李鸿章的得意门生，开口闭口“中堂大人”。对工人要打就打，要枷就枷，而看见洋稽查、洋工程师，只会低头哈腰，一副奴才相，真是连洋人放个屁也是香的。江南制造局过去只造木壳轮，这条“保民”轮是第一条暗轮，经手设计的是美国工程师劳勃生。洋人夸口说，这是世界造船工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总办、会办不懂装懂，也跟着大吹大擂。还搬出李鸿章的“手谕”，只许工人依样画葫芦，一切都得听洋人的。

我们工人可不吃他的那一套。我爷爷和他的师兄弟早先都在外国船厂里做过生活，无论木壳、铁甲，明轮、暗轮，商船、兵舰，差不多都动手做过。大家看了劳勃生的船样，发

现不少漏洞,特别是艄柱龙骨板烟斗(下舵承)与水规(舵)中线三眼不直,对不上号,这样造出来的船不但开不快,而且不能掉头转向。他们向轮机厂的委员指出船样的问题,说劳勃生的船样非大改不行。谁知道批评了劳勃生,却触痛了邵友濂、倪人涵这两个洋奴买办。他们火冒三丈,拍桌子大骂工人“有多大本领”?说什么“外国人打的样还会有错吗?难道中国的苦力比外国工程师还强”?大家气愤得说不出话来。好,既然当官的死抱住洋“葫芦”不放,就照他们依“洋”画“葫芦”,出出洋人的洋相吧。

“保民”轮造出来了。船壳用进口钢板,蒸汽机缩在船肚里面,在当时也算得是新式的了。试航那天,李鸿章特地指令邵友濂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宣传一番洋务运动的成就。可是洋“葫芦”里卖的却是一帖假药。“保民”轮试航到闵行,象乌龟游水一样足足在黄浦江里开了六、七个钟点,要回来了,却怎么也转不过头,只好一路倒着退回来。船上的总办、会办和洋稽查、洋工程师们,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工人们却笑痛了肚皮。

不会掉头的船有什么用?总办、会办又找洋工程师来商量,洋工程师只会搔头皮。后来,只好照我爷爷和师兄弟的办法,给轮船动了“手术”,船就开得快了,也能够掉头转向了。这件事,当时十传百,百传千,中国工人听了个个扬眉吐气,那些洋人、洋奴只好吃瘪。听说还有人将这事写进小说里去呢。

这一次,那些洋奴输了。可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们的奴才性,哪怕工人用二十四磅大榔头敲他们,也是敲不掉的。他们觉得这样造船造下去,都是我们工人的市面,太危险了,就宣传“造船不如买船”。原先一股劲地主张设厂造船的李鸿章,忽然换了一种腔调,说什么在中国造船所花的银子,比从外洋买船要贵一倍,不如直接从外国买回来便宜。据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强”起来。这样一来,成千上万两银子,从老百姓头上搜刮得来,象潮水般地滴进了外国资本家的腰包。你们想,一心只想侵略我们的外国资本家,怎么会让中国“自强”呢?当时我国的北洋水师的军舰都是进口的,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笨家伙,上重下轻,漏洞百出,经不起风浪,挡不住炮弹,更谈不上出海作战了。后来甲午战争,这批军舰全部被日本侵略者打沉了。

蒋介石的大进口与大拍卖

蒋介石上了台,江南造船所归国民党海军管。蒋介石把“发展造船工业”叫得震天响,其实呢,是拍卖国家主权,买进外国船舰。

就拿抗战前向日本订购的“宁海”、“平海”号两艘军舰来说吧!那个时候,我在江南造船所的木模厂做工,同设计科的下级技术人员有点来往,知道一些内情。听说这两艘军舰原定都是由江南造船所自己造的,蒋介石一听到就骂开了:“造个屁,外国船厂里有的是军舰轮船,有的是高明的专家,现成的船不去买,却在江南造船所里老牛拉破车,造到何年何月?我国地大物博,有的是矿产资源,外国人要,我们给。‘四海一家’嘛!”于是就撤销了制造“宁海”、“平海”舰的方案,向日本播磨造船所订购。“宁海”舰前后造了整整两年时间,造价高得吓人。船到码头,国民党大小官员带了太太小姐象接洋菩萨一样欢迎,还叫我

们工人也去参观，说是“开开眼界”，“学习外国先进造船技术”。好船坏船，可骗不过我们捏榔头柄的造船工人的眼睛。我们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就发现这条军舰不过是一只“绣花枕头”，外表好看，肚里一包草。舰身的钢板，十有八九靠拼补；主机地轴都用旧货翻新，表面尽是斑斑麻点；船体肋骨该用四吋角铁的却用二吋半的；甲板的倒挂龙骨也被抽走二道，船底又不平。别看它那么神气活现，其实全身都是病。

可是洋奴买办打的却是另外一种算盘，他们说：“日本那家船厂是国际上的王牌船厂，造出来的军舰当然也是王牌的。”我们工人听到了这种话，肺都气炸了，有的说他们长了个中国人的脑袋，拖了个外国资本家的尾巴；有的说他们不管西洋东洋，只要是洋，便是爷娘。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我们工人再也忍耐不住了，要求立即废除由日本承造“平海”舰的协定。蒋介石被迫把“平海”舰改由江南造船所承造，但是设计图纸、轮机设备、主要原材料等还是全部由日本播磨造船所提供，这个造船所还派了一个叫神保的总工程师来直接操纵，一切都是神保说了算。为了提高造价，整个舰身装装拆拆，一再故意返工，进口的设备材料，只要他说一声不适用，就重新购买。“平海”舰造好后，要开往日本装炮。当驶进日本海时，日方竟提出不得挂中国旗。当时舰上的员工十分愤慨，要求拒绝这个无理条件，舰长发电报问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的复电只有两个字：“照办”。你们听听，这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在这些洋奴买办们看来，只要能进口，什么国家的资源、主权，统统可以出卖给外国资本家。说来也真气人。就是那个神保，原来是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跑到江南造船所来，收集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后，又是他大摇大摆来接收江南造船所。而“宁海”、“平海”两条军舰，战争一打响，就被日本飞机一下击中要害，沉没在江阴附近的江底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换了个主子，向美帝国主义大开门户。蒋介石派了他的亲信、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马德骥担任江南造船所所长。他口口声声说要把江南造船所搞成什么“设备现代化、技术维新化、管理科学化”的工厂。怎样实现这几个“化”呢？办法就是一条：照美国的标准办。全厂的设计、施工要美国顾问点头，材料设备以至螺丝钉等等都从美国进口。原来他们的所谓全盘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全盘美国化。解放后我们才晓得，这些都是在抗战胜利初美蒋秘密签订的“造船借贷合约”里规定好了的。按照这个规定，美国在战后把大批剩余物资供给中国，由江南造船所接收使用，江南造船所必须在三十年内优先供给美国海军军舰及商船修缮和补给所需材料与人工；而且中国所有海港，美国军舰都可以自由出入使用。接受这样的进口条件，不是拍卖主权又是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国民党一面搞大进口，一面就搞大拍卖，就是要把中国搞成美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美国货泛滥，民族工业遭灾。仅在上海，三十多家小得可怜的中国船厂，关门的关门，转业的转业，剩不了几家，哪里还有一点“发展造船工业”的影子呢！

“东风”号在风浪中前进

解放了，天亮了。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工人有使不尽的干劲，可以为发展

祖国造船工业、建设社会主义大干一番了。在社会主义的江南造船厂里，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船台上的船也越造越多，越造越好，从排水量几百吨的小轮船到建造排水量一千五百多吨的长江客轮，从排水量五千吨的海轮一直到建造万吨级远洋货轮。在大跃进高潮中，我们决定造第一艘万吨轮，我高兴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象我这样经历过几朝几代，尝过甜酸苦辣的造船工人，做梦也想着有朝一日能用我们的双手，造出自己的万吨轮啊！说也凑巧，当时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造一艘“西风”号轮船。大家都说：他们刮西风，我们就让东风劲吹，让东风压倒西风。经过领导批准，这条万吨轮就定名为“东风”号。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们自己造的“东风”轮胜利下水了。

正当我们“江南”工人和兄弟厂工人一起高高兴兴地进入“东风”轮的安装工程时，突然从上面传来了一道道禁令：什么不准兄弟单位继续为“东风”轮协作造设备，什么要“东风”轮停工检查；并且派人来专门收集“东风”轮的黑材料。他们闭眼说瞎话，硬说“东风”轮“造价高，周期长，质量差，浪费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才知道，一手扼杀“东风”轮的就是刘少奇。正是这个叛徒、特务、内奸，在一九五八年窜到“江南”来的时候，当着一部分职工的面，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还说什么“造船工业最好自觉让路，否则就要被迫让路”。这不是李鸿章和蒋介石的调调吗？就这样，下水后的“东风”轮被迫在黄浦江里泡了四年多时间。江南造船厂也从此“以修为主”，“只修不造”，也就是说，把能造万吨轮又能造万吨水压机的大厂，只搞点小修小补。江南厂被糟蹋成“大吊车吊小壳子，大船坞修小驳子，大船台造‘小鸭子’”。我们工人看了，真心痛啊！

一九六三年，我是退休了，但我的心还时时刻刻挂在“东风”轮上面。我总要到厂里走走，看看那艘我曾为它流过汗水的“东风”轮。每看一次，我心里就翻腾起来，这么好的船，为什么硬说它质量差，硬要判它死刑？他们为什么总是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为什么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么不愿意看？这同当年的李鸿章、蒋介石究竟还有什么两样？这些问题，我们只有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开始懂得。解放后，公开身份的帝国主义洋奴买办是被赶跑了，但还存在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红色买办”刘少奇；只有深入批判了他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引路，才能有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泡在黄浦江里达四年之久的“东风”轮，就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够于一九六五年初又重新开工，当年年底就胜利交船。

说起“东风”轮，就一定要讲到我们兄弟厂沪东造船厂自力更生试制的八千八百匹马力的船用柴油机。沪东厂工人早在大跃进年代就开始试制这种机器了，可是坚持洋奴哲学的人却鼓吹向外国资本家购买专利。即使外国资本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他们都说“好，好，好”。比如，有两个外国万匹机的专利商提出的条件就有那么几条：什么中国造出的柴油机都要贴外国商标，每年造多少台要向外国资本家汇报，产品不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双方在技术上发生争执，要受第三国法律仲裁，等等。这不是要把我国造船工业缚在外国资本家的腰带上吗？沪东厂工人坚决顶住了这股歪风，并且一鼓作气造出了八千八百匹马力的柴油机。但迷信买专利的人心不死，他们一手压着不发国家鉴定合格证，不准继

续生产；一手又从另一个外国资本家那里买进专利。沪东厂工人坚决抵制了这种卖国投降行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造出了功率更大的一万二千匹马力的柴油机。据说，三年前，迷信买专利的人第三次提出要买专利，在工人群众坚决抵制下，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不仅国产万匹机的生产有了显著发展，而且我们江南造船厂也冲破重重恶浪，坚持在芦苇棚里闹革命，克服各种困难，自力更生造出了万匹机，并且装上了“风庆”轮，扬眉吐气远航了三万二千海里。

我们真不懂，有些人对于工人阶级坚持自力更生路线取得的胜利，为什么老是那么看不顺眼，切齿痛恨？他们对国产机吹毛求疵，污蔑是什么“瘟机”、“病机”，可是对进口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好几艘万吨轮上装的进口机，在动车、试航时都发生咬缸等现象，他们竟百般为它辩护，还说什么“外国机器出毛病是偶然的，国产机器出毛病是必然的”。他们这副洋奴买办的脸相同李鸿章一模一样，简直完全成了外国资本家的代理商了。

李鸿章还在借尸还魂

前不久，我的孙子力生参加了造船公司办的学习班，他回来说，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多引进的“大政策”以后，造船系统崇洋迷外的风又刮起来了。他们老调重弹，说什么“过去批崇洋迷外过火了”，攻击我们打的造船工业翻身仗是“搞乱了，搞糟了”等等。好家伙，这些人活象是当年的“还乡团”，向无产阶级疯狂地反攻倒算，恨不得一刀把自力更生方针砍掉，一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吞掉。什么“要多引进一点”，“要拿出更多的东西去换”，这不是要把我们的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等变成外国资本家的修配厂吗？不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中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吗？这当然是我们工人阶级万万不能答应的。我们决不是一概反对进口船舶，根据国家需要，进口一点也可以。但是，当动用了国家资金几亿元、几亿元地去买上百万吨外国旧船的时候，能不能少进口几条船，省下一点资金来，给我们造船工业武装一下，增加生产能力，把造船产量翻一番呢？他们的回答是一分钱也不给。真是岂有此理！毛主席最近说，“走资派还在走”。看来，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世代代就要同洋奴哲学斗下去。过去李鸿章、蒋介石、刘少奇、林彪做过一次次洋奴梦，结果都是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一次次破灭了。现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热衷于充当洋奴买办，想方设法要变社会主义中国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并且一手挑起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导演了一场反革命暴乱的丑剧。但是，反革命总是短命的，邓小平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他的洋奴梦也随着而又一次破灭了。我们要坚定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发展造船工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江南造船厂工人理论组整理)

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海自行车三厂革命委员会

我们厂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由二百六十多家小厂、小店合并建成的。到一九六五年年底，生产自行车的能力从建厂初期的八万辆发展到三十五万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厂在不增加厂房、场地、劳动力的情况下，主要靠挖潜、革新、改造，使自行车的年产量突破一百万辆，一九七五年达到一百一十万辆。品种也逐步发展到二十多个。我们厂生产迅速发展的事实，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证明，也是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有力批判。

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当然会碰到矛盾。我们在工作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在产量成倍增长的情况下，有一个短时期内，一度出现自行车车架接头返漆和车圈电镀脱皮等外观质量问题。消费者和商业部门热情地向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帮助我们改进。但是，邓小平抓住产品质量的局部问题，恶狠狠地挥舞起“全面整顿”的刀斧，向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攻倒算。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抓住自行车质量问题大做文章，说什么“质量下降了”是因为“政治搞多了”、“没有制度”、“管理搞乱了”，等等。这一切，使我们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段话：“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伟大的创举》）我们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认识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动群众，提高产品质量，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这不仅是为了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且是击退右倾翻案风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怎样才能继续在继续增产的基础上提高产品质量？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就是要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就是要坚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我们“政治抓多了”，因此“质量下降了”。这种话，岂不是要我们背离党的基本路线，背离无产阶级政治吗？我们回顾了建厂以来的历史，用事实回击了这种无耻谰言。在大跃进年代里，广大工人群众大讲无产阶级政治，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三年内自行车产量提高了近四倍。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毒害，所谓“政治要落脚到生产”的修正主义流毒也流到了我们厂，结果放松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上升，自行车产量也从大跃进时期的三十八万辆下降到十九万辆，并且出现连续五年徘徊的被动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

帅, 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 自行车产量很快就突破了一百万辆, 质量也稳定提高, 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这就说明, 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才能把社会主义生产搞得更好。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我们搞生产“根本说不上什么规章制度”, 这完全是胡说。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当然要求建立同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而邓小平所鼓吹的企业管理制度, 则是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过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按照这条路线建立的规章制度, 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 它必然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 我们厂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 搞什么“管、卡、压”, 严重地束缚了工人群众的手脚。文化大革命中, 我们通过斗、批、改, 逐步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并且正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建立比较合理的、有利于群众的规章制度, 邓小平之流对此疯狂反对, 其险恶用心还不明显吗?

事实胜于雄辩。九车间是专门加工自行车车架的, 由于场地挤, 当全厂年产量达到三十八万辆时, 工人群众从“螺蛳壳”里已经挖出了很多潜力; 现在年产量进一步达到一百一十万辆, 通过不断革新、挖潜, 加工能力又有大幅度提高, 但各道工序之间堆放场地无法解决。干部和工人经过讨论, 订出了前后道工序依次上班的制度, 基本解决了堆放场地的问题。类似这样依靠广大群众, 从实际需要出发建立和健全的管理制度, 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制度, 在鼓吹“正规化”、“文明生产”的修正主义者看来, 当然是不顺眼的。邓小平之流的攻击和反对, 正好说明我们是做对了。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不断改革不合理的陈规旧章, 不断建立和健全比较合理的管理制度, 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把企业管理搞得更好。

邓小平之所以气势汹汹地攻击我们的企业管理“搞乱了”, “搞糟了”, 他的罪恶用心, 是反对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 重新返回到“专家治厂”的旧轨上去。这是我们广大干部和工人所坚决不答应的。我们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 搞的基本上是“领导立法, 技术人员执法, 工人守法”那一套, 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工人提出一条革新建议, 真不知要经过多少道关卡, 才能取得试验权。结果, 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群众革新创造, 都由于过不了这重重关卡而被判处了死刑。经过文化大革命, 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 大搞群众运动, 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 生产纪录年年刷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 自行车产量每年递增率达到百分之十二以上。去年下半年, 我们为了提高产品质量, 把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交给群众, 同时, 组织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 把提高产品质量提到执行什么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这样, 在短时间内, 全厂实现了一百五十三项提高质量的技术措施, 对实现高产优质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我们厂在增产基础上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绩, 几个外观质量的关键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去年, 全厂自行车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质量也继续达到先进水平。今年以来, 我们深入开展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第一季度的自行车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 质量也有新的提高。我们决心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得更好。

努力表现无产阶级 同走资派的斗争

方泽生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迄今已有二十七年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二十七年，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斗争中蓬勃发展的二十七年。反映这一时期的斗争生活，努力表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党内走资派所作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的历史使命。

一定的文艺，总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呢？列宁说过：“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艺要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就要求作者根据党的基本路线，深入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从而通过艺术形象深刻地揭示这种阶级关系，敏锐地反映出阶级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这是文艺创作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自从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变了，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主革命时期跑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抵触，甚至反对，从同路人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明确地指出党内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为文艺创作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党内走资派利用职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是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方法。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个

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历史。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取得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是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作斗争中取得的。努力创作表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特别是更多地创作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深度的作品，这是历史的必然的要求。

实际上，这一历史的必然的要求，也已经日益成为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自觉的愿望。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新的文艺队伍。他们来自工农，来自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洗礼，提高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他们自觉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力求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各种艺术形式都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特别是涌现了一批反映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作品。象短篇小说集《序曲》和故事影片《春苗》等，都从正面表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表现了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却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开端。

我们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时代，都希望写得更深刻一些。故事影片《第二个春天》的创作修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再重读一九六五年的旧稿本，就“突出地感到不满足、不够劲”。虽然旧稿本也歌颂了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但是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揭示还不够充分和深刻。在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的处理上，实际上让设计师刘子茵占据了中心地位。而刘子茵同厂长、总工程师以及研究所长的矛盾，并不能从更高更广阔的政治历史背景上充分展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此，作者从今天的思想高度出发，重新认识和理解作品所表现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海军建设中的这场斗争，把这一场斗争置于当时国际国内反修斗争的“典型环境”之中，以工委书记冯涛为中心人物，以冯涛和厂长齐大同的冲突为主线，集中表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就使作品的思想意义提高了一大步。

象《第二个春天》这样力求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金钟长鸣》，反映文化大革命高潮以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敏锐地触及到“走资派还在走”这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就大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这些作品，都表现了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而且它们都力求揭示这一斗争的根本内容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并且在这种对立斗争中揭露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是这些作品最有深度的地方，也是它们成功的地方。

当然，这些作品用我们这一伟大时代对它的要求来衡量，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反

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也还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还缺乏经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性，都还缺乏深刻的理解，需要有一个使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就以对走资派的形象刻划来说，现有的作品刻划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走资派。其中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一类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飞雪迎春》中的丁之勤是前一类；《火红的年代》中的白显舟，《第二个春天》中的齐大同，《战船台》中的赵平，《樟树泉》中的潘伯祥等，属后一类。这样的走资派的典型，当然可以写，写得好，也是有教育意义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写得更有深度。就以白显舟这一形象的塑造来说，它基本上是成功的，影片对他错误行为的揭露，也比较深刻。可是究竟为什么“一个经历过炮火锻炼的老同志”会变成这样的呢？影片给观众的印象，似乎只是因为他“只有生产上的钢，却丢掉了总路线这个纲”，被一个反革命分子蒙住了眼睛。可是，为什么白显舟会丢掉了总路线这个纲？为什么他对资产阶级分子如此亲近，言听计从；而同赵四海、同工人却总是格格不入、合不到一块儿去呢？影片未能进一步深入解剖白显舟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揭示他之所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成为走资派的政治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这样，也就影响到影片的思想深度。

同《火红的年代》相比，《春苗》对杜文杰这个走资派形象的刻划，就要深刻一些。影片没有限于揭露杜文杰的种种罪行，而是深入到他灵魂深处的那个资产阶级王国，触及到了走资派所赖以产生和生存的基础——资产阶级法权。拼命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党内走资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抓住了这个特点，也就抓住了走资派的要害。杜文杰正是这一资本主义旧土壤里长出来的新毒草。感到不足的是，影片虽然触及到了这个根本问题，却未能更充分、更深刻地去揭示它。

有的作品往往把走资派写成“两截子”的，就是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切皆好，只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停顿了，落后了，倒退了。实际上，这些人之所以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正在于他们灵魂深处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本质上只是一个跑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毛主席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对那些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不肯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了深刻批判。这种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们又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所以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跑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无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有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革命，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规律。所以，刻划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典型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刻划走资派的典型形象，还应该研究走资派的活动规律，研究他们的反革命策略。邓

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就很值得研究。他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在他认为反革命复辟的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就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折衷主义的诡辩论造反革命舆论；而当他利令智昏，自以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就赤膊上阵，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当革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起来的时候，他就接过革命的口号，把真理歪曲成谬论；而当我们党调整政策，以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的时候，就伺机反攻倒算，抛出其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刮起右倾翻案风。当然走资派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反革命策略也各不相同。但是不管他们如何变化多端，总是有规律性的。揭示这种规律性，也就能够提高文艺作品中的走资派形象的典型性。

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来说，刻划走资派的反面形象，是为更好地塑造和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服务的。它在作品中只能处于陪衬的地位。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象革命样板戏那样，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在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决不能是资产阶级，这是文艺领域究竟由哪个阶级来专政的原则问题。

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必须处理好歌颂和暴露、光明面和黑暗面的关系。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指明了的。社会主义文艺，同资产阶级的所谓“暴露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当然要揭露资产阶级，揭露党内走资派，但是揭露他们，是为了伸张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气，鼓舞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同他们作斗争，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决不是相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所谓写光明和黑暗并重的谬论所作的深刻的批判，至今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问题如果搞颠倒了，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

要表现好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关键还在于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塑造好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党内走资派的存在，就一定会产生它的对立面——敢于同走资派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人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大量地涌现出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有责任去表现他们，歌颂他们。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就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题材来说，就是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同走资派的艰巨而曲折的斗争中，塑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形象，塑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英雄形象。

我们在银幕上，在舞台上，在文学作品中，已经看到许多这样的英雄形象。象春苗、龙国正、冯涛、赵四海、雷海生、郭子坤等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既有久经革命锻炼和考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干部，也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还有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站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最前列的先进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作者塑造这些英雄形象，都努力突出他们的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这种觉悟又表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

争和路线斗争，对党内走资派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这种认识是不是他们头脑里固有的呢？不是。《春苗》中的田春苗是个纯朴的农村姑娘，她对走资派杜文杰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小说《初春的早晨》中的郭子坤，是一个政治上很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对走资派及其反革命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同样有一个过程。这种认识，又正是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本身在发展，在深入，我们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英雄人物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是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能够站在时代斗争的前列，带动群众去完成历史已经提出的任务。郭子坤就是如此。他不是天生的英雄，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场革命他当然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在他面前冒出来的许许多多具体矛盾，对他来说都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他能够比别人更敏锐地觉察到这些问题，比别人更深刻地把握这些问题的实质，因此也能更及时、更透彻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他善于在斗争中学习，善于在斗争中思考，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有我们伟大的党在领导和教育着他，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指引着他。

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塑造敢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如何体现党的领导作用，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走资派作斗争。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其中有许多本身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党的工作者。一个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的。他们的世界观，要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没有党的领导和实际斗争的教育，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把群众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郭子坤不就是党培育出来的无产阶级战士吗？作为一个工人，在他的头脑里，不可能自己长出马克思主义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能是党灌输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每一部作品都必须表现这种灌输过程。作品如何体现党的领导，要由它的特定的主题、题材、人物来决定。但是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应该体现党的领导作用，这个原则对任何作品都是普遍适用的。《初春的早晨》并没有因为郭子坤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当时他所在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就因此而不体现党的领导作用。我们所说的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我们从《初春的早晨》这篇小说中，鲜明地感受到正是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领导着这场伟大的革命，在指引着郭子坤，给他指明前进的方向，成为他的智慧和力量的

源泉。郭子坤自己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党的旗帜就是我们的生命”。

无论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还是刻划走资派的反面形象，都有一个避免雷同的问题。文艺创作之所以出现雷同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缺乏生活，缺乏对生活的深刻的认识，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共性和个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实际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真正做到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不会雷同。

许多优秀作品的经验表明，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虽然难度很高，但经过努力是一定可以写好的。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还在于作者自己要作为一个战士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投身于当前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去。因为正如鲁迅所说的：“自己不在漩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要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作者的世界观一定要完成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即使是写民主革命的题材也肯定写不好，更不用说正确而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了。

十年前，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提倡文艺创作反映和歌颂社会主义革命，表现“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的斗争，就是要在文艺领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题材的问题，而是一个路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从来是有斗争的。一九六三年，柯庆施同志根据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提出写十三年。写十三年，也就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是这一正确主张在当时却受到文艺黑线的激烈的围攻。京剧革命的战斗历程，更是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斗争中诞生的革命样板戏，深刻描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壮丽史诗。这里不但有革命战争的历史画卷，也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疯狂仇视和反对革命样板戏，就是因为它们为社会主义的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向革命样板戏学习，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深信，在集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推动下，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歌颂社会主义革命，歌颂文化大革命，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问世。

读洪皓《江梅引》

顾易生 王运熙

傲霜斗雪、预报春信的梅花，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曾经为多少进步作者吟咏赞叹，借以寄寓高尚的怀抱和美好的理想。宋代洪皓（公元一〇八八——一一五五年）的《江梅引》词，是其中值得注意的篇章。

洪皓生活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期。这是一个风狂雨骤的时代。随风披靡的纤草，屹立苍穹的劲松，轻艳柔媚的桃李，铁骨冰心的梅花，都在时代风雨的面前表现出不同姿态。公元一一二六年，处在我国北部的金朝贵族军事集团大举南侵，腐朽的北宋政权迅速土崩瓦解，中原地区人民遭到极其野蛮的屠杀和掠夺。广大义军和爱国兵将虽然进行了英勇反抗，而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政权，顽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采取种种手段破坏抗战力量。洪皓是在南宋建立的第三年（公元一一二九年）被任为“大金通问使”到金朝去的。

就在这年，金贵族以宗弼（兀朮）为元帅长驱南下，一路烧杀，攻破南宋政权所在地杭州，赵构逃上船只，飘荡在海上过年。只是由于大江南北军民的奋勇反击和牵制，才迫使金军北撤。洪皓到了金朝，留在太原一年，送至云中（今山西大同），金贵族强迫他到金朝扶植的伪齐傀儡政权中去做官，他誓死不屈，因此被流放到冷山（在今吉林）。在漫长的羁留岁月中，不管是高官厚禄的引诱，砍头的威胁，还是流徙生活的折磨，他始终巍然不动，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还找各种机会向南宋秘密递送情报，请求“复故疆，报世仇”，恢复国家统一。十余年来，他无愧为挺立在北国冰雪中的红梅。

这时期中，由于金贵族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宋方军民的越战越强，金贵族逐渐改取招降的政策，这与南宋统治集团的投降心理一拍即合。于是抗战派被完全排斥了。公元一一四二年“和议”告成，宋高宗上誓表向金朝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放弃淮水以北全部土地。金朝也同意送回放置着宋徽宗、郑皇后尸体的棺木和高宗母亲韦后这些废物。同年四月，南宋派信安郡王孟忠厚等为使者至金朝护迎。夏至晚上，洪皓听说使者将来，不禁百感交集，写了四首《江梅引》词^①，通过吟咏梅花，抒写强烈的爱国感情。

《江梅引》第一首《忆江梅》是对南宋爱国力量的深切关注。上阕是：

^① 《江梅引》是词牌名，即《江城梅花引》。唐李白诗《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调名本此。洪皓这四首词，前三首分别取第一句末三字为题，即《忆江梅》、《访寒梅》、《怜落梅》，第四首题名已缺，依例疑当为《雪欺梅》。

天涯除馆忆江梅^①。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②。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愁谁？

作者流迁在北方天涯海角，却无限深情地向往着江南的梅花，遥问它现在有几枝盛开。听说南方将有使者前来，多么盼望他们能把杭州报道春天信息的梅花捎到燕台来啊。可是经历千山万水，梅花想必也要凋谢零落，满腔衷情还能向谁诉说！

洪皓被留在金朝这十四年中，迁移过许多地方，一居太原，二至云中，三迁冷山，四至燕，后又被遣至云中，不久再回燕。（见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所以他的《江梅引》自序说：“顷留金国，四经除馆，十有四年，复馆于燕。”这时他的心情，就象战国时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虽在流放之中，时刻忧念着乡国。他在被留十二年时作了一首《临江仙·怀旧》：“冷落天涯今一纪，谁怜万里无家？三闾（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憔悴赋《怀沙》。……何时还使节，踏雪看梅花？”梅花，象征着南宋的爱国力量。在洪皓看来，爱国力量的消长，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况闻谋帅得廉颇，蔺卿全璧我蹉跎。”（《浣溪沙》）作者曾为抗战派的一度被任用而振奋，迫切期望自己能光荣完成使命。可是现在订立了屈辱的和约，山河分裂，南方抗战派人物，有的被杀，有的被贬，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带来北方呢！唐代杰出法家柳宗元《早梅》诗说：“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用梅花的销落寄寓革新派被打击的愤慨。洪皓借用其句，表示对抗战派受摧残的悲愤。

作者期望自己能回到南宋投身爱国斗争的行列，夺取抗金事业的胜利。可是能否实现呢？又不禁无限忧虑。下阕是：

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他徒然憧憬着笑摘梅花的欢乐情景，思念故乡而不能回去，真是回肠寸断。聊且抚着绿绮琴，弹一曲《梅花三弄》，神魂仿佛飞向了遥远的南方。突然耳边传来胡笳声，才警觉到自己仍然处于金朝的统治之下，触动满腔哀怨，泪水沾湿衣襟。插满梅花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将来了。打算独自将诗吟，又怕一夜东风，损伤花朵，理想又成泡影。

洪皓在《江梅引》自序中还说，这四首词中“各有一‘笑’字，聊以自宽”，反映他在沉重

① 除馆，变易羁留的馆舍。《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晋国将把扣留的各国使臣季孙意如移置到边远地区时说：“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说：“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

② 余杭，即杭州，南宋临时都城，也名临安。作者原注：“白乐天（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忆杭州梅花诗云：‘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车驾（指皇帝）时在临安。”表示这是当时政治中心。

春信，指梅花。南朝宋陆凯自江南寄梅花一枝给在长安的范曄，并赠诗云：“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别信，聊赠一枝春。”（见《荆川记》）燕台，相传战国时燕昭王筑，延请天下贤士，故址在今河北易县，这里借指燕京，暗示自己客居异地。

的悲哀中还保持着一点乐观精神。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说：“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期望迈着健壮的步伐，寻访远处的梅花，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满插繁密的花朵。这里化用其意，给歌词添上美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可是洪皓心目中的爱国力量，主要只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的抗战派，他们虽有“还我河山”的壮志，却不可能破除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也不能克服南宋政权的投降主义路线，因而洪皓的琴音歌声尽管一时唱出了比较高昂的曲调，最后仍陷于沉郁悲凉。“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苏轼《梅花》，洪皓词化用其句）在当权的投降派打击下，抗战派怎能不摧残飘零呢！

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致肖军、肖红信》）南宋时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金朝贵族军事集团的什么拐子马、铁甲军并不可怕；而混在南宋政权中的投降派得了势，却可以破坏抗金事业。《江梅引》第二首《访寒梅》上阕接触到这样的事实：

春还消息访寒梅①。赏初开，梦吟来②，映雪衔霜，清绝绕风台③。可怕
长洲桃李妒，度香远，惊愁眼，欲媚谁④？

词中说：要探访春还大地的消息，还得向寒梅问讯。作者梦游江南，对着初开的梅花放声高吟。那梅花丛环绕着凌风台映雪怒放，清幽绝伦。可怕的是长洲桃李妒忌心重。梅花尽管芳香远播，惊动我一双愁眼，却又能得到谁的欣赏？

这里首先热烈歌颂了南宋抗战派在抗金斗争中的光辉战绩。紧接着，控诉了投降派破坏抗金事业的严重危害。“桃李”，在古代诗歌中常用以比喻得势小人。白居易《新栽梅》诗：“莫怕长洲桃李妒，今年好为使君开。”就是以桃李来隐喻那时当权的腐朽势力。本词中改“莫怕”为“可怕”，揭示了一条沉痛的历史教训。

公元一一四〇年，宗弼又一次发动全部兵力南侵，他极端狂妄地扬言：“江南军队都是败亡之余，大军一到，他们君臣将要心破胆裂，连哀鸣都来不及，好象被射中过的鸟，听见弓弦响就会跌下来的。”（《金史》卷七九《郾琼传》）然而广大爱国军民的铁拳却粉碎了他的迷梦。刘琦的“颍昌大捷”、岳飞的“颍昌大捷”等，杀得金军人翻马仰，太行山和两河地区人民义军纷起呼应，抗金战争出现空前有利形势。洪皓在这年给南宋的情报中说：

颍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宋史·洪皓传》）

次年又送回情报说：

虜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随军，今不敢携。朝廷不知虚实，卑辞厚币，未

① 这句化用李白《早春寄王汉阳》诗：“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

② 作者原注：“王昌龄《梦李白》作梅花诗。”

③ 两句化用南朝梁何逊《咏早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

④ 两句化用杜甫《十二月一日》诗：“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天。”

有成约，不若乘胜进击，再遣犹反掌尔。（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

指出这时已是金朝贵族怕宋人，是恢复国家统一的大好时机。然而南宋统治者心窍中已浸透了投降主义，正蓄意对抗战派进行迫害。这点洪皓在写《江梅引》时已有所认识了。

金贵族逐渐知道南方军民不可战胜而南宋统治者愿意投降，于是派遣叛徒秦桧到南宋充当内奸。请看金朝的档案：

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兀室忧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赵鼎、张浚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玠则习知于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阴有以从，遂纵秦桧以归。（《大金国志》卷二四）

由于大地主阶级反人民的本质，南宋统治者害怕金贵族，更害怕爱国军民力量壮大会影响自己的反动统治，因而宁愿充当敌人卵翼下的“儿皇帝”，求得“偏安”。在抗金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一天十二道金牌的退兵命令下来了；在主子“必杀岳飞，方可议和”的指令下，战场上杀得敌军望风丧胆的英雄，竟死在内奸的“莫须有”冤狱之中。

在投降派打击下，南宋许多抗战派人物都被贬逐到广东、湖南、福建等南方边地。洪皓在《访寒梅》下阕中，更浮想联翩，飞向他们谪居的遥远南国，进行亲切的慰问：

曾动诗兴笑冷蕊，效少陵①，惭《下里》②。万株连绮③，叹金谷，人坠莺飞。引领罗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极丽，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④。

诗人曾经效法杜甫歌咏寒梅，惭愧的是自己词句拙劣缺少文采。可叹那花树万株、建筑宏丽的金谷园已经破败，园中人坠身亡、娇莺飞散。遥望岭南的罗浮山下，翠鸟变成梅神的婢女。在明月清辉下，梅神的语言多么清丽，姑且把对梅花凋谢的担忧放在一边，一起饮酒同醉吧。

杜甫有诗说：“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动诗兴”、“笑冷蕊”是借用杜甫的诗句比喻自己过去对抗战派的赞美。“金谷”是西晋贵族石崇的花园。他有歌女绿珠善吹笛，权臣孙秀因求取绿珠害死石崇，绿珠在园中跳楼自杀。南朝江总《梅花落》诗：“金谷万株连绮蕊，梅花密处藏娇莺。”词中借用这些典故隐喻抗金事业的被破坏和抗战派的受迫害。广东的罗浮山，以产梅花著名。古代传说，有个叫赵师雄的流迁到罗浮，遇到梅花之神，一起谈话饮酒，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大梅树下。（见《龙城录》）美丽而迷离的诗境透露了爱国者同投降派作斗争的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

① 少陵，杜甫自称“少陵野老”。

② 《下里》，先秦时一种俚俗曲调。

③ 绮，指绮罗，有花纹的服装。

④ 笛曲中有《梅花落》，这里用“玉笛吹”借指梅花落去。唐崔櫓《崖梅》诗：“初拜巴人踏露圆，未落先愁玉笛吹。”

第三首《怜落梅》，作者进一步倾吐对爱国人物的热爱。“怜”，是“爱”的意思。

重围佳丽最怜梅，慵春开，学妆来，争粉翻光，何遽落梳台。笑坐雕鞍歌古曲①，催玉柱，金卮满②，劝阿谁？贪为结子藏暗蕊，敛蛾眉③，隔千里。旧时绮罗，已零散，沈谢双飞④。不见娇姿，真悔著单衣⑤。若作和羹休讶晚⑥，坠烟雨，任春风，片片吹。

词意大致说：深闺中的佳人最爱梅花，在春暖花开时节，她打开窗户学习梳妆。梅片随风飘进窗来，落在妆台之上，和洁白的香粉交映辉光。遥想前人，有的骑着骏马雕鞍，放声高歌，豪情满怀；有的坐在梅花树下，独自抚琴，逸兴飞扬；可是环顾四周，自己形单影只，满酌金杯，向谁劝饮呢？在那远隔千里的南方，梅花贪图结子把暗蕊隐藏，使人双眉紧锁，黯然神伤。从前的豪情逸趣已经风流云散，过去的酒伴歌侣也音信渺茫。梅花美丽的姿态已经看不到了，真懊悔穿着太单薄的衣裳。但要用梅子调味作羹还不嫌晚，试看在烟雨迷蒙中片片落梅正被东风吹送四方。

庸俗的人迷恋妖艳的桃李，清丽的佳人爱赏高洁的梅花，爱国者之间也是这么惺惺相惜，相互爱慕的。作者在出使前和抗战派张浚等有相当交谊，这里借用白居易“沈谢双飞出故乡”等句，当是追忆过去的爱国活动和悲慨抗战派的相继被排斥。词的最后，心情是怅惘的，却寄寓着殷切期望。

第四首《雪欺梅》，描绘了在南宋卖国政权统治下抗战派遭受严酷压迫的图景。上阙说：

去年湖上雪欺梅。片云开，月飞来，雪月光中，无处认楼台。今岁梅开依旧雪，人如月，对花笑，还有谁？

去年西湖边上白雪欺压梅花，忽然浮云飘散，月光飞泻，雪月光中，辨认不出哪儿是楼台。今年梅花开放，依然是白雪皑皑。人象天上明月一样皎洁明亮，但又有谁对着梅花笑逐颜开？公元一一三八年和一一四一年，宋金进行过两次和议活动。南宋政权中投降派对反对和议的人进行迫害，造成一片白色恐怖。第一次和议后，由于金朝贵族的片面毁约南侵，抗战派一度起来，取得鼓舞人心的战绩，然而在投降派出卖下，这些战果又被丢弃了。

① 这句化用李白《襄阳歌》：“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指《梅花落》曲，汉代乐府横吹曲中已有此曲。

② 两句化用南朝陈江总《梅花落》诗：“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柱，乐器上的弦枕木。卮，古代盛酒器具。

③ 南朝梁萧纲《梅花赋》：“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蛾眉。”

④ 白居易《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诗：“薛刘相次埋新壤，沈谢双飞出故乡。歌伴酒徒零散尽，唯残头白老萧郎。”白氏自注：“薛刘二客、沈谢二妓，皆当时歌酒之侣。”

⑤ 两句化用北周庾信《梅花》诗：“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觅不见，真悔著单衣。”

⑥ 和羹，古人煮羹时用盐醋等调味，用梅做酸的调味品。《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第二次和议达成时，投降派的恐怖活动更普遍地展开。白雪纷飞，漫天盖地，象征着反动势力的疯狂，而梅花的不惧霜雪、凌寒开放，烘托了爱国力量的崇高品质。

在进行投降活动的同时，南宋政权正式定都杭州，在那里大造宫室园林，歌舞升平。然而清醒的爱国者坚持与这种倾向进行斗争，双方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阕云：

一枝两枝三四蕊。想西湖，今帝里，采牋烂绮。孤山外^①，目断云飞，坐久花寒，香露湿人衣。谁作叫云横短玉^②，《三弄》彻，对东风，和泪吹。

作者遥想西湖一带，除了一两株梅花在开着稀花外，腐朽的统治者，把这临时避难所当作永远的安乐窝，在制礼作乐，庆祝“中兴”。但作者随着孤云南飞，极目南望，还可看到就在湖中孤山之外，梅花仍在怒放，夜深花冷，芬芳的露水沾湿了诗人的衣裳。更有人正和着泪水，对着东风，横着玉笛，吹着《梅花三弄》，笛声嘹亮，响彻云霄。

公元一一四三年六月，金朝贵族头子生子大赦，洪皓被遣回乡。他立刻上道，金人旋即派骑兵追赶不及。一路归来，他想到被扣十五年，侥幸得返南方，但国家依然分裂，中原人民仍受着金朝贵族奴役，真是感慨万千。“客程恨不日千里，归思乱如云一川。故国伤心那忍说，遗民望眼几回穿。当家旧事堪垂泪，海上看羊十五年。”（《奉使燕山回早行即事》）这是他归程中所作的诗句。他一到南宋，便和投降派展开面对面斗争。他责问秦桧：“张丞相（张浚）为金人所害怕，为什么却不得任用？杭州是暂时居住的地方，而宫殿太庙造得这样华丽，岂不是示意不要中原么？”（《先君述》）他又揭露金贵族与秦桧勾结的情况。这位苏武式的人物当即被贬逐出外，不久又被流放到英州（今广东英德）看管。“半世囚拘愧牧羊，生还四载却投荒。”（《过曹溪》）正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域中啊！

洪皓这四首《江梅引》，从对梅的忆念、访问到爱慕、歌颂，以丰富多采的画笔，描绘了精美而宽广的梅花画卷，反映了南宋时期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里有美好的憧憬，热烈的追求，深沉的忧思，愤怒的谴责，交织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当然，由于地主阶级抗战派的历史与阶级局限，不可能和广大人民相结合，无力制止南宋统治集团的投降活动。这就使洪词常常流露出孤芳自赏、清冷寂寞的情调。

大量化用成语典故，是《江梅引》的特殊艺术手法。这些成语典故，既含蕴丰富的历史内容，耐人寻思体味；又赋予新意，不局限于原来意境，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由于他处在金朝贵族统治下，南方也是投降派当权，不可能畅所欲言，因而用了这样曲折的语言，寄豪情于隐约，借前人杯酒以浇胸中垒块。这四首词，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地统一，洪迈《容斋五笔》说，“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争传写焉”，在当时是起了宣传爱国思想的作用的。

① 孤山，在西湖中。北宋隐逸诗人林逋曾居住于此，种植许多梅花。

② 叫云，响彻云霄的意思。唐姚合《和徐先辈秋日游泾州南亭呈三二同年》诗：“叫云寒角动城楼。”

掀掉这筵席！

——读苏修短篇小说《宴会》有感

雍 昌

这个在一家工厂的餐厅里举行的宴会，对厂长布尔拉克来说是充满幸福的。这不光因为宴会是在庆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名义下举行，而且布尔拉克今天也能陶醉在“美味”的食品“享受”之中！

厂长布尔拉克“是爱喝白兰地的”，人还未到，三瓶阿美尼亚白兰地就已经放在“主席团”的席位前了。布尔拉克刚坐下，又送来了一盆盆五颜六色的下酒菜。他一见填馅的梭鱼，就一口断定：“这可是一道犹太菜啊。”当然，他的这种见识是从多次的宴会中得来。你听，他在向别人介绍说：“阿勃拉姆·约瑟霍维奇在生日那天请我吃过，几乎有半条鱼全给我吃光了。”好大的口福哪！布尔拉克能荣幸地饱尝口福是没啥稀罕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引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现今的苏联，各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然会通过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表现出来。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仅被披上种种“合法”的外衣，而且还被苏修党以“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从理论和路线上加以维护。谁在苏修党内作了大官儿，“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就会铺天盖地向他涌来。就象市委指导员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今天被布尔拉克请来作客一样，布尔拉克也经常被别人请去赴宴。难怪作者断定他“已不是第一年当领导”的首要依据，就是他那被酒菜喂肥的“微微挺出的肚子”。

和苏修厂长布尔拉克的豪阔气魄相比，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醉汉》中的旧厂主富罗洛夫也难免会自惭形秽。富罗洛夫和别人在馆子里吃完酒，还要忍痛掏出九百二十五元四角；而布尔拉克举行这次盛宴，只消在固有的“厂长基金中支付”就是了。一百多年前的富罗洛夫，怎么也不会懂得“厂长基金”是啥玩意儿，这可是苏修叛徒集团的一大发明。随着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高额利润，在整个工业部门全面推广了所谓“新经济体制”，用各企业增加利润分成的办法，搞了名目繁多的“经济刺激基金”，并且规定厂长有权“支配企业的财产和资金”。在一个号称“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中，厂长竟然拥有一笔“厂长基金”，并能运用它来冷酷地惩罚一部分不愿意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人，“刺激”另一部分工人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还能作为厂长别墅的资金，举行宴会的现款，这样一来，那个“全民所有制”不就成了道道地地的“厂长所

有制”，或者官僚垄断资本家所有制了吗？新资产阶级布尔拉克的“厂长基金”和老资产阶级富罗洛夫的九百二十五元四角一样，都是压榨、剥削工人所取得的剩余价值。两者的不同仅在于，“厂长基金”是靠厂长的政治权力攫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钱袋，就是整个国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苏修当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比沙俄时代的资本家还厉害。

苏修厂长布尔拉克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对于工人群众是鄙视的。这从布尔拉克同厨师柯洛文之间的关系便可看出。虽然布尔拉克“每天三次把胃信托给”厨师，但向来“对于厨师，习惯是不去注意的”。这个习惯的养成绝非偶然。因为在布尔拉克眼中，柯洛文只是自己出钱雇用而来、有一定烧菜“生产技能”的工具而已。“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是在今天的宴会上，布尔拉克突然喊柯洛文也参加宴会，这就显得奇怪了。难道几杯白兰地软柔了布尔拉克的心肠，使他把柯洛文当作“人”来看待了吗？且慢，让我们看看布尔拉克下一步的表演吧。

当食堂主任、党委书记先后对柯洛文说了一番“热情话”，柯洛文仍不出来时，布尔拉克发火了，“平时曾对他的厂长工作起过不少作用的固执的天性”，使得“现在他对任何违反他的意愿的情况怎么也不能忍受”。世界上哪里看见宴请时有这样可怕的面孔？他呼唤柯洛文出来，无非就象拿出一件自己所拥有的商品，在诸位食客和市委指导员面前炫耀一番，以显示自己的富贵。当然喽，布尔拉克也会在高兴的时候给他喝点剩羹冷酒，但这只是一种“刺激”，也就是“刺激”他作为生产工具更加卖力地为资产阶级效劳。遗憾的是，柯洛文并没有认识这一点。当他忘情地在宴会中大杯喝酒，直到酩酊大醉，闹翻起来的时候，就被毫不留情地拉了出去，并被布尔拉克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其职务，并不发退职金”。就象一件商品，当它已失去应有的效用，反而触犯到主人利益的时候，就会被主人一手摔掉一样，柯洛文也被布尔拉克赶走了。不管布尔拉克对柯洛文玩弄什么花招，“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饿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就是布尔拉克对待工人群众的立场和态度。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何等地凶残和狠毒，广大工人群众是怎样地处于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这就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的苏联的阶级关系的图景。

反动的人口论者马尔萨斯曾经引用过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他自己又添上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这鲜明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敌视工人阶级的丑恶嘴脸。现在，布尔拉克也以他的所作所为替宴会写了块说明牌：柯洛文来赴厂长的宴会，但这里没有工人的席位，于是就命令他滚蛋。布尔拉克统治下的工厂是一席吃人的宴会，苏修叛徒集团统治的整个苏联社会，又何尝不是一席吃人的宴会呢？柯洛文被布尔拉克赶出了工厂，出路在哪里呢？告状吗？没用，布尔拉克是通天的。你看，在工厂的宴会上，不仅部里发来了贺电，连市委指导员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也亲自赶来参加了。这就说明，这个宴会决非寻常，它带有“官方”的色彩，直接受到“上级领导”、甚至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支持。再找工作吧？很难。在苏修，自从实行“谢基诺试

验”和“科学劳动组织”以后，各工厂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有成千上万的职工被踢出工厂大门，苏联每年大约有二百万人不工作或失业，挣扎在死亡线上。即使侥幸进了厂，那也只能意味着更直接受资产阶级剥削，“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今天的苏联大地，到处都摆着资产阶级欢乐的盛宴，哪里还有工人群众的活路啊？

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翻列宁亲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残暴的法西斯专政下，灾难是深重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布尔拉克和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每天都在进行这种可耻的“谋杀”，他们所举行的大小宴会，他们整个社会的资产阶级大筵宴，就是建筑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这种宴会，就象鲁迅所揭露的黑暗的旧中国一样，是“人肉的筵宴”。它的本质是“吃人”。“吃人”的魔鬼就是苏修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被“吃”的就是象柯洛文那样千百万劳动群众。这是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后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拥护邓小平的反革命暴徒们不是狂妄地叫嚣“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吗？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步苏修的后尘，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可见，一旦党内资产阶级得势，不仅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连民主革命的成果也要被推翻。到那时，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们设酒所摆的筵宴，就必然和今日的苏联一样。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斗争锻炼的中国人民，是决不允许苏联复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的。

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今日的苏修叛徒统治集团也是这样，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的“人肉的筵宴”进行辩护。柯洛文为什么会遭到悲惨的命运呢？布尔拉克把责任全部推在柯洛文大醉以后的所谓“行为悖理”；竟敢爬到市委指导员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身上去吻她；对着厂计划科科长耳朵打了一拳；总工程师的一件新西装也给弄脏，等等。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拯救溺水者，要靠溺水人自己的手”。

吃了人还说是那人该吃，这真是刽子手的逻辑。柯洛文的遭遇难道应由他本人负责而不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造成的吗？是你们，正是你们统治下的苏修社会，才使千百万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水深火热之中，把他们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剥夺殆尽，于是他们感到没有出路而极端苦闷，才用喝酒来麻醉自己，以求喝醉以后至少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痛苦，“既然社会丝毫不关心他，注定他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真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够责备他呢？”（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你们，正是你们统治下的苏修社会，在政治上用法西斯手段残酷地迫害和镇压千百万劳动人民，对于一个忍受了你们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工人，难道还能要求他醉后仍然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

当然，我们从柯洛文悲惨的命运中也看到，只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只要整个苏联大地上还闹腾着资产阶级的筵宴，那末，工人阶级就一天也避不开它的

统治，一天也保不了有被“人肉的筵宴”“吃”掉的危险。单个的工人利用酗酒来反抗这个社会，是无济于事的。鲁迅曾经写道：“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的话是正确的。在今天的苏联，要拯救千百万被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人肉的筵宴”“吃”掉的劳苦大众，就必须靠苏联人民起来推翻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统治。“千里搭长篷，没有不散的筵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内大大小小“人肉的筵宴”必然会被苏联人民所推翻。这是一定的！

附：宴 会

作者 斯·斯·斯米尔诺夫

(载苏修《文学俄罗斯》1975年第4期)

工厂里一派节日气氛。三天前颁布了最高苏维埃的命令，授予工厂劳动红旗勋章，奖励它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为了庆贺这件事，俱乐部里举行了晚会；晚会以后，还要在食堂里举行宴会(这是工人们说法)或者“聚餐”(这是厂领导小心翼翼的说法)。宴会的费用全由厂长基金中支付。

宽敞的餐厅里灯火辉煌，许许多多小桌子拼凑在一起，连成了一张“U”字形的大桌子，罩上了雪白的台布，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下酒菜和一瓶瓶伏特加酒、啤酒和矿泉水。在“U”字形桌上只有在通常被称为“主席团”的席位前，放着三瓶阿美尼亚白兰地——大家都知道，厂长和总工程师是爱喝白兰地的。

四个女服务员，戴着硬花边的头饰，穿了镶硬花边的围裙，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把一盘盘菜肴从厨房端到了餐厅，煞费苦心地、巧妙地把它们放在早已摆得满满的桌子上。负责总务工作的副厂长哈恰图尔·巴格拉托维奇·波罗席扬是个阿美尼亚人，他身材高大、笨重，嘴唇又厚又大，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卷发，两道白色的眉毛在一张黑黝黝的胖脸上显得格外突出。他把两手放在背后，活象一个将军在检阅军队，神气活现地迈着大步子在桌旁走着。在他后面，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就象阅兵式指挥陪着检阅者那种样子，食堂主任柯连卡用细碎的步子跟着。他长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一束曲卷得异样的、油光光的蓬发覆在额上，从他的模样看不出他的年龄有多大。厂里，从厂长到工人，全都叫他柯连卡，除了女服务员和厨师以外，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和父名。

“柯连卡，座位准备得够吗？”波罗席扬严厉地问道。

“哈恰图尔·巴格拉托维奇，按照您的吩咐，准备了六十个座位。不够的话，可以再加上一张桌子；再不行，就加两张。座位是不成问题的。我只是在想，要不要把这张标语给取下来？放在这儿好象不大合适。”

柯连卡指了指“主席团”席位后面的墙，墙上面在紧靠着天花板的地方，用图钉钉着一张纸色已经有点泛黄的横幅标语，上面用大红字写着一句口号：“同酗酒作斗争！”两个月前共青团员讨论了关于同酒癖开展斗争的决议，这条标语就是在那时挂上去的。在标语的下面，是厂医用图钉钉上的两幅彩色宣传画：“消灭苍蝇！”和“流行性感胃是一种传染病”，后一幅画的画面上画着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的脸，一对瞪得大大的仿佛十分惊讶的眼睛特别引人注目。

波罗席扬停了下来，看了看墙壁，他那饱满的嘴唇懒洋洋地颤动着，读着那句口号。

“‘同酗酒作斗争！’写得对啊。干吗要把它取下来呢？难道我们也打算酗酒？你要明白，我们只不

过是少量地喝一点，高兴高兴，庆贺一番。这同酗酒有什么相关？让它挂眷。柯连卡，你别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懂不懂？”

他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样子，举起了象灌肠一样粗的手指。他说话带有很重的高加索口音，所以食堂主任的姓被他读成了柯涅莱卡。

柯连卡点了点头说：

“明白了。当然，写是写得对的，可是我想……我们既然开宴会……”

“我已经跟你讲过一百次了，这不是什么宴会，而是一般的聚餐，”波罗席扬的脸上露出了不满的表情说。“你要知道，这完全是两码事。”

一提起“宴会”这两个字眼，厂领导就感到害怕，大伙儿都还记得，前厂长就是因为热衷于开宴会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部长扣了一大笔款子。

波罗席扬看了看表说：

“他们马上就要来了。热菜有吗？”

“那还用说，哈哈图尔·巴格拉托维奇，当然有。准备了煎鸡肉块，保证大家吃得连手指也要舔个不停。”

“为什么不做基辅式肉饼呢？”波罗席扬皱了皱眉头说。“我对你说过，要准备一道基辅式肉饼。”

柯连卡两手一摊，耸了耸肩膀说：

“厨师长不同意，哈哈图尔·巴格拉托维奇。他说，基辅式肉饼不能事先做好，这道菜只有一炸好马上端到桌上才能尝到真正的味道。而六十客菜要炸多长时间。他坚决不肯，还说，他不愿在大伙儿面前丢丑。于是，就决定做煎鸡肉块了。”

“你瞧，简直是个了不起的演员！”波罗席扬冷笑了一声。“‘不愿当众丢丑！’是个好样的，你懂不懂！”

他走近桌子，把一盘盘下酒菜仔细地端详了一下：

“果真是个大师。每道菜都做得简直象艺术作品一样，你懂不懂！简直使你看得出神，口水直流。说实在的，在莫斯科的‘阿拉拉特’饭店也做不出这样的好菜。真是一位大师！怎么，他不喝酒？”

“一点也不喝，哈哈图尔·巴格拉托维奇，”柯连卡使劲地摇晃着他的额发。“这已经是第四个月了。他连啤酒也不喝。只喝一种波尔荣矿水。我不是对您说过吗，这样的好手我们是再也找不到的。他在沙皇的厨师那儿学习过。沙皇，虽是个寄生虫，但是论吃，他还是懂得不少的。我不是说过吗……您还记得吗？当时您还不想要他呢！”

波罗席扬的一对油光光的眼睛紧紧地盯住桌子不放，两道白色的眉毛微微地抖动了一下，说：

“是的，是不想要。这有什么办法呢，到处对他的鉴定都是这样：好酗酒，你懂不懂？是个大酒鬼，不论到哪儿工作，全给人撵走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是他戒了酒，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瞧，大家来了！”

弹簧一响，一扇面朝马路的门打开了，参加聚餐的人陆续走进了食堂的前厅。他们聚集在洗手盆旁边，一边脱大衣，一边高声地交谈着。波罗席扬和柯连卡及时地赶到门口，迎接厂长布尔拉克。

布尔拉克长得十分结实，精力充沛，他的外表和他的姓很符合①，只是他那变得微微挺出的肚子和威风凛凛的举动才会使你感到他已不是第一年当领导了。

他走进了餐厅，搓了搓手掌，尽管在街上并不算太冷。他对已经见过面的波罗席扬点了点头，然后向食堂主任伸出了手，为了让前厅里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放开了嗓门说：

“柯连卡，庄严的庆祝仪式已经结束了，下面就轮到你的余兴节目了。你可别搞糟了！”

柯连卡开玩笑似地把两手贴紧裤缝，眯缝着一对本来就不大的狡猾的眼睛：

“是，不会搞糟的，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正象俗话说的，我不是新嫁娘了。”

“等着瞧吧！”

厂长把手插进了裤袋，摇摇晃晃地，象水兵在甲板上走路一样，从门口朝里边走了几步，打盘了一

① 在俄语中布尔拉克表示纤夫的意思。

下桌子和房间，便把目光转到了天花板下面的那句口号上。

“同酗酒作斗争！”他读完了这句口号，就转过身来，对着那些跟在他后面走进餐厅的人们，指着标语，大声地说：“你们看啊！这是柯连卡在向我们暗示，他的伏特加酒不够。这可不行，柯连卡，今天你有多少东西，全部都得拿出来。要是今天你的伏特加酒不够，那末我们自己就要和你作斗争！”

他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嗓音低沉，但很响亮，以至于整个餐厅都充满了他的笑声。别人也跟着他笑了起来，有的人还围绕着这一话题开了几句玩笑。连柯连卡也笑了，但是他的一对小眼睛立即转到了波罗席扬身上，好象在说：“您看，我是怎么对您说的？现在您可明白了？”

“好了，别浪费时间了。大家可别拘束，我们不是在开会。”厂长又开玩笑地说：“同志们，请入席吧！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就象在一出歌剧里唱的那样：‘请允许我把手伸给您！’”

他殷勤地伸出路臂，朝着出现在餐厅里的市委指导员走过去。她是一个高个儿、长相很漂亮的女人，她的黑发中间夹着一绺显眼的白发。他把她带到桌子前面，半开玩笑半讲礼貌地让她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坐在他自己座位的右边，而自己却习以为常地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拿出一包“卡兹别克”牌香烟，点着了烟，等着大家入座。在厂长左边坐的是总工程师，人长得又高又瘦，在他的额上有一道很深很长的红色伤疤，胸前佩戴着勋章绶带。再过去的是“O”音很重的伏洛格达人，党委书记达维道夫、副厂长波罗席扬和厂工会主席捷连邱克——一个小个子，老是手忙脚乱的乌克兰人，他象个坐不定的小男孩，老是在椅子上面转来转去，不停地跳起来发号施令。这里入座的还有厂里的最有经验的技师和工人。其余应邀出席的人移动着椅子，兴高采烈地坐到长桌的旁边。大伙儿都穿戴得整整齐齐：深色的服装，还打了领带。女宾除了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之外，只有五个人，从节约考虑，决定不带夫人参加聚餐。

大伙儿就座之后，布尔拉克便站了起来，说：“请大家斟满酒杯！”在等大家斟酒的时候，他才第一次仔细地看了看摆满了酒菜的宴席。

“好啊！”他窘惑地拖长了声调说：“这才算得上是酒菜啊！你们看，还搞到了整条的鲟鱼。柯连卡可真行啊！”

柯连卡象一个殷勤的主人，自己站着不坐，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打量着是否一切都已安排妥贴。听到厂长说的话，他举起了手，表示不同意：

“这和我毫无关系，费得尔·郭尔杰伊奇。这都是我们的厨师长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的功劳。他的门路广，鱼是他弄来的。”

“你呀……瞧，小猪崽子！这只坏蛋还在笑呢！”厂长继续欣赏着这道菜。“嘴里还有香芹。你们看啊，绿茵茵的，色香可多好啊！这是什么？”他指着另一长盘鱼问。

“是一道填馅的梭鱼，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柯连卡得意洋洋地解释。

“是吗？”布尔拉克惊讶地说。“这可是一道犹太菜啊。向你们介绍，可好吃呢！阿勃拉姆·约瑟霍维奇在生日那天请我吃过，几乎有半条鱼全给我一个人吃光了。”

他向坐在长桌旁的计划科科长郭洛霍夫斯基点了点头。科长便笑着晃了晃光秃秃的脑袋。

“来吧，阿勃拉姆·约瑟霍维奇，在这方面你可真是个专家了，你来给这道梭鱼评一评！”布尔拉克建议。

在哄堂大笑声中，郭洛霍夫斯基把自己的碟子递了上来，放上了一块梭鱼。他装腔作势地皱了皱眉头，用叉子叉了一小块，慢慢地送到嘴里。整个筵席鸦雀无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计划科科长细细地咀嚼着。突然，他的一张圆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他疑惑了一会，不相信第一回尝出的味道，于是又叉了一块放到嘴里。

厂长哈哈大笑了起来，说：

“真象个品味员！你可别再折磨我们啦，阿勃拉姆·约瑟霍维奇。该下结论了。”

郭洛霍夫斯基对于人们的笑声和戏言一点也不加注意，慢条斯理地咀嚼着第二块鱼，咽下去后，举起手来，要大家安静下来。他说：

“我可以担保，这的确是一道高质量的好菜。我向你们直说，就连我的丈母娘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们要知道，填馅梭鱼是我丈母娘的拿手杰作。我还可以向你们担保，这位厨师一定是个犹太

人。只有犹太人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梭鱼来。”

透过笑声传来了柯连卡的男高音：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姓柯洛文。只不过他非常精通各种口味的烹调技术——俄国式的、犹太式的、法国式的，甚至还有意大利式的……看，这道是什么菜？谁能说得上？”柯连卡指着一盘倒上了黄色调味汁的淡绿色的素菜问，接着便洋洋得意地自问自答：“谁也说不出。这道菜你们一定是从来没有吃过，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吃到，除非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而且即使在那两个地方也不一定吃得到。这道蔬菜叫芦笋，是法国菜。”

“是芦笋？”总工程师惊奇地问道。“他从哪里搞来的？我还以为，芦笋也和白匪一起逃亡国外了。”

“这芦笋是从莫斯科给他运来的。”柯连卡解释道：“我已对你们说过了，他的门路很广。连他的徒弟也在莫斯科的高级饭店里做菜，专门供应外国的旅游者。而他自己沙皇的厨师那儿学习过。”

“厨师长可真行啊！”厂长的大嗓门又响了起来。“你找到这样一个好厨师，柯连卡，应该好好地酬劳你一下。下次发奖金时，一定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哎，他的老毛病怎么样？……”他富有表情地用手指弹了弹自己的硬领子。“他在这方面好象意志比较薄弱……”

“没有问题！”柯连卡摇晃着他的额发回答说。“现在他连啤酒也不喝。已经快四个月了，他一滴酒也不喝。只喝一点波尔荣矿水。”

“真是好样的！”布尔拉克赞许地说。他猛地想起来了：“可我们自己全都不是好样的。酒杯里的酒斟得满满的，可我们却只顾讲话。好吧，亲爱的同志们……”他举起自己的一杯白兰地。

厂长提议为全厂的集体干杯，他向在座的人员表示祝贺，祝贺他们获得政府的崇高奖赏，然后宣读了部长的贺电。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党委书记达维道夫、一个获得劳动英雄称号的工长、一个获得勋章的工人、总工程师、厂工会主席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相继发了言。他们为工厂，为厂长，为市委，为工厂的党组织，为妇女，为总工程师，为各个车间主任和各科科长干了杯。酒席上闹个不停，尽是欢乐的喧闹声，发言的人愈来愈感到困难，要压倒这些声音可真不容易。在每次的祝酒词之后，象往常一样，人们交谈着，争论着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车间里出现的一些不顺利的事情，议论着哪些工作还没有做好，哪些事情尚待去做，等等。大伙儿还不断地异口同声地称赞厨师的手艺。一盘盘的下酒菜很快地吃得一干二净，女服务员又从厨房里不断端来新的菜，一瓶瓶酒也不断送上来，取下一只只空酒瓶。

“是啊，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厨师，”厂长一边在尝炸小猪的脆皮，一边在说。“炸得真好啊！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莫斯科的招待会上我也没有吃到味道这么好的菜。而且外形设计得多好啊！同志们，这就是一种生产技能，在我们的车间里往往就是缺少这样的生产技能。”

“味道好极了，”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赞同地说。“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完全有权评价。以后，市里如果要招待重要客人的话，我们一定要向你们借用这位厨师。”

“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我对您说，”坐在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旁边的老工长彼楚金插话说：“工人对这个厨师，卡施卡，是非常满意的。”

工长有个习惯，几乎在每句话里都要放进“可以这么说”这几个字，而且讲得非常快，含糊不清，以致把“可以这么说”说成了“卡施卡”。正因为这个缘故，在车间里大家在背后都叫他“卡施卡”。

“以前那个厨师，卡施卡，同他真是有天壤之别。”工长激动地说。“工人们经常破口大骂，卡施卡，还骂娘呢。我自己那时就不到这里来吃饭。从家里带几块夹心面包，喝上一杯茶就算了。吃饭就到老婆那儿去吃。现在，卡施卡，情况就不同了。我又到这里来吃午饭了。味道很好，一点也不比家里的差，而且，卡施卡，品种繁多。工人阶级对他很满意。费得尔·郭尔杰伊奇。”

“好了，”布尔拉克说。“下次给人们发奖金时，一定不忘记他。”

手忙脚乱的小个子，工会主席捷连邱克手里拿着一杯满满的酒，蹦蹦跳跳地走到厂长跟前，高声地说：

“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我想从本职的角度上提议，让我们为广大的工会会员群众干杯！”

他说起话来已经是含糊不清，翘鼻子也有点发红，一对失去了光泽的醉眼已经开始有点斜视了。

“齐洪，你得小心点，”党委书记达维道夫以一种“O”音很重的地方口音开始说话了：“要是人人都从

本职的角度提议干杯，你会喝得酩酊大醉的。”接着，他责备地摇了摇头。

“说得好，赏二十个戈比！”厂长哈哈大笑起来。“你啊，工会领袖，真的是干杯干得太频繁了。你知道吗，在我们军队里有一道口令是：‘间开一些！’而且要多吃菜呀，多吃一点——哎，你看，菜做得多好啊！”

但是厂长还是和工会主席碰了杯，并为广大的工会会员群众干了杯。

下酒菜吃完之后，女服务员开始端送热气腾腾的炸鸡肉块和油炸土豆丝及醋渍李子。厂长切了一小块，尝了尝味。于是就摇了摇头。

“你看，”他对总工程师说。“好象已经饱了，不想再吃了，可不知不觉地还会把它送到嘴里。这也说明菜肴做得太好了！”

“哎，土豆丝啊，土豆丝啊！”总工程师几乎是哼叫了起来。他津津有味地咬着炸得发脆的土豆丝，傻乎乎地眯缝着眼睛。“丝毫不比巴黎的逊色。老弟，这道菜叫做土豆咸饼。”接着他又以一种不容反驳的口吻说：“咳，我们已经好长时间不习惯吃味道好的东西了，这次尝到了这样美味的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食品应该给人们带来享受。”

“说得对！”厂长点了点头。“这些年来我们顾不上管吃的。随便什么东西，往嘴里一塞，只要胃里不空，不影响工作，就又继续干下去了。对于厨师，习惯是不去注意的。喂，柯连卡！”他突然喊了一声食堂主任。“厨师长现在在不在这里？”

“怎么会不在呢，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柯连卡说话的声音简直带有一种委屈的味道。“这样的事情他能信得过别人吗？没有让你们吃饱之前他是不会离开厨房的。他在那儿指挥厨师，领导……”

“那末，你去把他领到这里来！我们大伙儿要感谢他。他确实为我们出了不少力。”

于是柯连卡便向厨房跑去。在那儿又闷又热，不知什么原因有一股特别浓的鱼腥味，三个青年厨师满脸通红，头上戴着白帽子，穿着并不是很干净的罩衫，站在炉子旁边，在许多平底锅和钢精锅上忙碌着。厨师长柯洛文已经是个上了岁数的人，一张严肃而又粗鲁的脸，两排坚硬的牙齿，他正在气势汹汹地责备他的一个下级：

“这简直是敷衍了事，哪儿是在工作！”他恼火地说。“你太马虎了，准是个好吃懒做的人。你是在给人做饭菜，还是在喂猪呀？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就是有名的外科医生，人们把自己的胃信赖地交托给他，这在人们的一生中最多也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而对我们，人们却是每天三次把胃信托给我们。这一点你应该经常想到。”

“得了。这些话我听了至少有一百次了！”青年厨师反驳说。

“如果你还打算给人做吃的，那你就得再听这第一百零一次。要是不能做到不敷衍了事，那还是上车间锯铁条去吧。铁条，人们是不会去吃的。你真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太马虎了！”

柯连卡抓住怒气冲冲的厨师长的袖子，把他拉到了一旁。

“我们走吧，斯杰潘，到餐厅去。”他催促地说。“大伙儿请你去呢。你做的菜他们都很爱吃。很喜欢。他们要感谢你。走吧！”

“我不去。”厨师长闷闷不乐地说，一边从被柯连卡拉住的袖子挣脱出来。

“怎么？不去？”柯连卡呆住了。“是费得尔·郭尔杰伊奇厂长请你去啊，还有党委书记以及其他一些人呢。他们都想向你致谢。”

“就是不去！”柯洛文固执地、恼火地重复了一遍。

“为什么？”

“去了他们会逼我喝酒的！”厨师长几乎是在喊叫。“这我是有体会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对我来说，现在去喝酒就等于上吊。你自己一定还记得，喝醉了酒，我常常是个什么样子……我已克制了三个半月……我是不会去的，你也别再来劝我了！”

“这样不太妥当吧，斯杰潘。你不喝就是了。就让他们为你干杯好了，你自己可以不喝，要么就喝一点波尔荣矿水。”

“我知道的。他们一定会劝我喝的，而我又是经不起人家劝酒的。我说不去就不去。他们爱吃我做

的菜，就让他们多吃一些好了。有什么可感谢的呢——我做的只不过是份内的事。我现在还有几只大蛋糕要去做完呢。”

于是他走到桌子旁边去。柯连卡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便回到餐厅，走到厂长的跟前，轻声地对他解释。

“你瞧！”布尔拉克开始以低沉的语调说道。“你的厨师长是怕羞，还是怎么的？大家，工人阶级叫他来，而他却固执地不来。哎，柯连卡，你真不会教育人啊！”

“我去请他。”党委书记达维道夫说完了就朝厨房走去。

过了五分钟，他有点困窘地回来了，重新又坐到位子上。

“他不肯来。”党委书记苦笑了一下，以此回答了布尔拉克询问的目光。“生怕硬要他喝酒。看来，还是别去硬拖了吧？费得尔·郭尔杰伊奇。就让他耽在厨房里。”

布尔拉克已经有点喝醉了。平时曾对他的厂长的工作起过不少作用的固执的天性，这一下大大发作起来了。现在他对任何违反他的意愿的情况怎么也不能忍受。

“这么说，就连党委书记的热情话也无济于事了？”他讥讽地问。“怎么，难道我们会把他吃了？他不想喝酒，那就别喝呗，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也不肯上同志们这里来，这难道是应该的吗？……嗨，你们这些宣传鼓动员，光会大喊大叫，还算什么头头呢！这么说，只得采用行政手段了。怎么样，他的名字和父名是怎么叫的？叫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啊哈！”

于是，厂长便亲自到厨房里去。

两个青年厨师正在炉子旁边忙着，另一个则和厨师长在一起，站在一张盖着不锈钢板的桌子旁边，桌上有五只大蛋糕，蛋糕上别出心裁地用各种不同颜色的奶油点缀出各种各样的花纹。厨师长把手伸进一只大罐头里，抓了一把鲜绿色的粉末，撒在大蛋糕上。

青年厨师见到厂长，都停下手来，向他行礼，盯着他看。厨师长也转过身来，放下了罐头，匆匆忙忙地用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笑了笑，嘴里露出了他那坚硬的牙齿。在他没有喝醉的时候，见到了职位高的首长，他总是感到胆怯，在他那张通常阴沉的脸上顿时失去了严肃的表情，露出一一种腼腆拘束的笑容。

“你好，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布尔拉克用了很大力气紧紧地同他握了握手。接着厂长就走到青年厨师跟前，同样地跟他们一一握手问好，然后又回到厨师长那儿说：“你怎么搞的？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干吗要惹大家生气？这样可不好呀。”他带着一种责备的神情摇了摇头。

厨师长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一种抱歉和不安的神情。

“我不是要惹人生气，厂长同志。”柯洛文低声地说。“我不能喝酒。我要是一喝醉就够呛了。不想在众人面前丢丑。”

“不想喝，就别喝呗。我们决不会因此而把你打死。可是，在这样的大喜日子里应该去祝贺祝贺同志们。你是刚来我们厂工作，对我们大伙儿还不大了解。这个集体可好呢，和睦、团结。怎么可以不去向他们祝贺呢？就连部长还来了贺电呢！老弟，不应该得罪工人阶级。对你的手艺，大伙儿也想表示谢意。小伙子们，今天你们给我们做的菜可做得好呀。谢谢你们！”他对几个青年厨师说完这番话后，又去催柯洛文：“走吧，走吧，不要再象姑娘一样扭扭怩怩了。你迫使我这个厂长自来请你了。”

厨师长带着和往常一样的笑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开始解开围裙的带子——对于上级的话他还会不会拒绝。然后，他打开了小柜子，脱下自己身上的工作服，换上一件新的、干净的，把一顶又高又白的厨师帽戴在头上。

“对了，早就该这样了。”厂长唠唠叨叨地把他推到门口。

厨师长一到餐厅，大伙儿就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年轻人甚至还高呼起“乌拉！”柯洛文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站在桌旁频频点头。

“同志们！”厂长大声地说，他那洪亮的声音把大伙儿的吵闹声压了下去。“我们的厨师长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也来祝贺我们受到政府的嘉奖。让我们一起为他的健康干杯，感谢他的高超的手艺和辛勤的劳动。他今天为我们做的菜做得好极了！”

所有的人又热烈地欢呼起来。大家拿着酒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小个子的工会主席已经是东歪西

倒地穿过椅子走到厨师长面前，几乎是强制地把一杯白兰地塞到他手里。

“我不能喝，捷连邱克同志，”厨师长央求地说，竭力使自己的说话语气更加肯定些。“我不能……我会喝醉的。”

“那不行，这样我们是通不过的，”工会主席醉醺醺地反对说。“你难道不明白，我们这是为谁干杯？是为荣获勋章的英雄集体，是为广大的工会会员群众！”

桌子的另一头，人们都在高声地、有节奏地叫喊：“干杯！干杯！”大家都拿着酒杯站着，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厨师长。厨师长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一种惘然若失和可怜巴巴的样子。他象求援似地望着厂长。

“那就喝一杯吧，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厂长说。“向同志们祝贺一下。喝一杯就算了。我们不会让你多喝的。”

厨师长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绝望的神情。他不住地眨眼睛，象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环视了一下餐厅，全神贯注地望着手中的酒杯。

在大吊灯灯光的映照下，带有金色色调的白兰地闪闪发光。厨师长久久地望着这杯金黄色的酒，突然，他猛地把头向后一仰，以一种为老喝酒的人所惯有的姿势把一杯白兰地倒入口中。餐厅里又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也跟着喝了起来。

“很好！”厂长赞许地点点头。“再吃点菜，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同大家闲聊闲聊。在那儿你的助手照样能把工作做好的。”

“厨师长同志！”郭洛霍夫斯基在自己的座位上叫了起来：“到我们这里来吧，这里有个空位子。您做的梭鱼我尝过了，可以这么说，这简直是个杰出的作品。”

厨师长带着开朗的笑容，向他走去。但现在他笑得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没有丝毫的腼腆和胆怯，笑得怡然自得。

他坐到郭洛霍夫斯基的旁边。而郭洛霍夫斯基则一个劲儿地夸赞他做的填馅梭鱼。不知是谁殷勤地在一只高脚的大酒杯里倒了一点伏特加，又把它递给了厨师长。厨师长就接过了酒杯。一直怀着不安的心情看着柯洛文的柯连卡连忙跑到他身旁，低下身子对他说。

“斯杰潘，够了，别喝了吧。啊？”他带着央求的口吻低声地说。

厨师长满不在乎地回过头来看了看他。

“喝得够不够我自己懂得。”他粗暴地大声说。“不用你给我下指示！”

他把一只高脚大酒杯放到桌上，拿起一瓶伏特加酒，给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然后还是老样子地往嘴里一倒，就象倒在桶里一样，一滴也不留。

“这才象是喝酒！”旁边有一个人又钦佩又惊讶地说。

柯连卡痛心地点了头，就走开了。他很明白在这种场合要去劝说厨师长是无济于事的。

在第二天午休前，布尔拉克、波罗席扬、总工程师、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坐在厂长室里。所有人的脸色都因宿醉而变得阴沉沉的，工会主席还不时地皱着眉头，用手揉着太阳穴——他的头象要裂开似的疼痛。他们正在讨论一个生活问题。讨论时大家都表现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就连布尔拉克也不象往常那样精力充沛，他默不作声地听着别人的发言，漫不经心地望着雨点斑斑的窗户。

柯连卡走了进来，同样是郁郁不乐，心灰意懒。

“嘿，怎么样？”厂长问。

柯连卡摊开两手，耸了耸肩：

“不在家里。他的妻子说，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向邻居要了四分之一公升的酒，喝完就走了。现在一定在他的朋友家里，准是在喝酒。他这样至少要喝上两个星期，我是清楚的。”

“难道他以为我们会等他两星期吗？”厂长生气地说。接着他问波罗席扬：“你把命令写好了没有？”

波罗席扬默默地把一只红色的公文夹交给了他。厂长打开公文夹，轻声地读着：“鉴于厨师长柯洛文的酗酒、行为悖理和无故旷工，即日起解除其职务，并不发退职金。”

“是啊！”他慢吞吞地说：“柯连卡，你给我们找来了一个厨师。他在技术上确实很好，但这有什么用呢？完全丧失了人性。你想想，他竟敢爬到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身上去吻她，弄得她满脸口水，甚至还乱抓乱摸。人家是市委的指导员啊！往后我简直不知如何去向她道歉呢。而且他干吗要揍郭洛霍夫斯基？”

波罗席扬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他们争了起来，你懂不懂？犹太人的‘济美斯’这一种菜该怎么做。厨师长说的，阿勃拉姆·约瑟霍维奇不同意，于是他们就争了起来。厨师长，你懂不懂，就抡起了拳头对着他的耳朵打了一拳。总工程师走来劝解，也挨了一拳。”

这时，总工程师苦笑了一下，摸了摸自己颧骨上的青块，说：

“这倒是小事，不大显眼。可我的一件新西装被这个坏蛋给弄脏了——这就糟得多了。今天早上我爱人把西装送到化学洗染店去，好不容易说服他们收了下来。还说，污迹可能洗不掉。真可惜，是块好料子呢。”

“还打碎了价值六十八个卢布的餐具，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柯连卡轻声地说。“在拉他出去的时候，他打翻了两张桌子。”

“这笔钱要从你的工资中扣除，厨师是你找来的。”厂长大声呵叱。“这个狗娘养的，把我们这样好的一个晚会全破坏了。最伤脑筋的是，在卡比托琳娜·巴甫洛夫娜面前多不好意思呀！现在市委里会怎样议论我们呢？”

“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党委书记达维道夫说：“当时我就说过，不必硬把他拖到餐厅里来……他自己也不想来。是捷连邱克逼他喝酒的。”

“谁想到他会这样胡闹的呢？”捷连邱克抱怨地说：“我以为他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他皱了皱眉头，又开始揉他的太阳穴。

“我跟你讲，达维道夫，不能这样看问题。”厂长咕哝地说。“要是你自己清楚，喝了一杯就会发酒疯，那就应该克制自己，坚持不喝。他不喝，我们又不会打死他的。他又不是孩子，快要五十岁的人了。正如俗话所说的，拯救溺水者，要靠溺水人自己的手。”

“我们是不是让他去治疗一下？”达维道夫建议。

“已经治疗过两次了，”柯连卡摆摆手说。“好了一、二个月，就又犯了。这一回，他坚持了近四个月，但是……你们自己也看见了……”

“不，我们没有功夫跟这种人周旋。”厂长斩钉截铁地说。“达维道夫，我同你两个要管一个厂，要管计划，要管整个集体。我们怎么能围着一个酒鬼厨师去转？不能这样，对不起！”

他从桌上拿起了一支很粗的红铅笔，在命令上签了名，把公文夹合起来，递给了波罗席扬。

“好吧，吃饭去吧！”他便结束了讨论，说。“明天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大家一声不响地走出办公室，各自分手。以后一整天他们个个都闷闷不乐，心绪暴躁，仿佛是在生谁的或者是生自己的气。

而柯连卡来到人们正在吃饭的餐厅，皱皱眉头看了看挂在天花板下面那句“同酗酒作斗争”的口号，叫了一个炊事员来：

“来，格里沙，拿把梯子来，把这玩意儿取下来。”他指了指说。“已经发黄了，上面全是苍蝇屎，脏透了。该取下来了！把这两幅画也一块儿拿掉。”他用手点了点两幅卫生宣传画。“人家在这儿吃饭，而它们却在讲苍蝇和传染病。让它们挂到别的地方去吧！”

于是，他踏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一张张发票上签字。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 译）

司马光登台一年

康 立

“禁中夜半定天下，仁风义气彻修门。

十分整顿乾坤了，复辟归来道更尊。”

这是北宋末期江西派诗人黄庭坚为了美化宋哲宗年间的“元祐更化”而写的一首诗。意思是：宋王朝改变了王安石变法的路线，一股劲地刮起“仁风义气”，彻底“整顿”了被变法扰乱的“乾坤”，大地主顽固派“复辟归来”，他们信奉的孔孟之道也更加尊严了。

元祐更化，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复辟事件，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复辟派的头子就是司马光。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从元丰八年（公元一〇八五年）五月到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九月，仅仅一年多时间里，顽固派得势，革新派被大批打下去，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遭到彻底废除，出现了全面复辟的严重局面。司马光是怎样导演“元祐更化”那场丑剧的呢？

走 马 上 任

元丰八年五月，从洛阳到开封的官道上，一个“齿发衰朽，精力昏耗”的大臣，在一群扈从簇拥下，冒着初夏的骄阳匆匆赶路。他就是新任副宰相司马光。“春风得意马蹄疾”。司马光内心里充满着狂喜，但一路上脸色严峻，简直象花岗岩雕出来的一样，纹丝不动。

熙宁三年（公元一〇七〇年），司马光为了发泄对变法的不满，一怒之下，弃官回到洛阳“隐居”起来。“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司马光俨然以桃花源中人自居。

司马光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表面上是闭门专修《资治通鉴》，扬言对“朝廷之事未尝挂虑”。他果真从此不问政治，只想当一个小小的“散官”了吗？不，这个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头子，一分钟也没忘了抨击新法，他日夜梦想重新上台，“改变此法”。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始终说新法不好的，只有一个司马光！”揭露他是一个与新法为敌

到底的家伙。

为了表明复古的决心，司马光特地按《礼记》的规定，缝制了一套古色古香的礼服穿起来。他在洛阳崇贤坊独乐园中，挖了间一丈多深的地下室，叫做“壤室”，躲在里面煽阴风，点鬼火，大搞地下活动，人称“司马家入地”。他还用硬梆梆、圆滚滚的木头做枕头，取名“警枕”，稍一转侧，枕头滚动，就惊醒过来，想起变法，想起顽固派地位岌岌可危，“中夜之间，一念及此，未尝不失声抚心也”。多年来，司马光“日夜引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推翻新法。这里有诗为证：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
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看！这个“野夫”身在林泉，心存朝廷。对变法的“不胜愤懑”，驱使他顽固地挣扎着重登朝廷，象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使新法“消伏”。如今，他当上了副宰相，真是“积年之志，一朝获伸”，“野夫”的野心炽烈地燃烧起来了。

把司马光重新推上前台的，不仅是他那股反变法的凶猛劲头，更重要的是站在他背后的整个大地主顽固派。司马光所以“隐居”洛阳，因为这里“邻家并侯伯，朱门掩芳菲”，是北宋世家大族的堡垒区。变法打击了大地主势力，“此时桧与柏，不及道旁花”，他们是何等痛心疾首啊！于是，“穷贵极富”的文彦博，敢于讲人所“不敢言”的富弼，北宋最著名的“巨室”韩、吕两家的韩维和吕公著，道学家程颢、程颐、邵雍，以及其他因反对新法而下台的大官如吕海、范镇、范纯仁，纷纷麇集于这个顽固派的大本营，形成了官僚大地主反变法活动的策源地。

这个顽固派集团是司马光的依靠力量，而司马光则是他们最狂热的辩护士。他认为，“贵贱贫富”是老天爷规定的，“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并露骨地叫嚣：“天要你穷，你偏要富，天要你愚蠢，你偏要聪明，这样就必然要受天刑！”司马光的命运，同顽固派的地位和利益紧密联系着。他是顽固派手中一把出鞘的宝剑，凡是“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为重”。围绕着司马光，组成了各种顽固派小集团，如“真率会”、“耆英会”，吟咏作乐，无不以攻击新法为目标。这样，整个大地主顽固派把司马光奉为自己的总代表，为他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吕海嘱咐他：“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苏轼从外地寄诗给他：“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文彦博给他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说辽国宫廷里在演这样一出戏：一个演员扮作变法派，见东西就取，另一个人拿着大棒狠狠地打击他，此人就是司马光。意思是，连我国北方境内的辽国贵族集团也希望司马光操起大棒，把变法派打下去。司马光受宠

若惊，连忙“愧谢”。总之，宋王朝内外的反变法势力都渴望司马光重新粉墨登场，并且把他当作自己心目中的“真宰相”而推上了台。

司马光受整个大地主顽固派的托付走马上任了。他决心拚老命大干一场，把顽固派的“祖宗之法”统统恢复过来。

全 面 翻 案

司马光果然没有辜负大地主顽固派的期望，登台后立刻劲头十足地推行废除新法、全面复辟的路线。

他首先抓舆论。还在正式登台以前，他就连续上疏，危言耸听地说：近来士大夫都不敢讲真话了，应当“广开言路”，让大家“尽情极言”新法造成的所谓“朝政阙失”和“民间疾苦”，让那些对新法不满并且要算账的人发泄“积年愤郁之志”。这是号召攻击变法的动员令。此令一下，攻击新法的信件雪片般飞来，达几千封之多，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其实，在全国就这么一点反对新法的信件，正说明真正坚持顽固派立场的人并不多。何况经过复查，来信中有不少是赞成新法的。司马光却抓住这个机会，挥起了全面翻案的大棒。元丰八年四月，他上章要求去掉所谓“新法之病民伤国者”。他当了副宰相，第一个建议就是“请更张新法”，针对当时新法已部分废除的情况，大骂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再次狂呼：“决不怕把其他一切新法都去掉！”司马光真是铁了心，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他的眼里，只有顽固派的“祖宗之法”，才是“百世不可变”的，至于新法，那必须立即推翻，就象“救焚拯溺”一样，“岂可坐视而不改”！

“十分整顿乾坤了”。这是司马光推行反动路线的主要手段。还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道学家程颢、程颐早就鼓吹：“今日却要先整顿。”如今，顽固派正式打出了“整飭风俗，修振纪纲”的黑旗。司马光破着嗓子叫嚷，当务之急是要对新法“痛加厘革”。所谓“厘革”，也就是“整顿”。“凡百措置，率由旧章”，一切都要扭回到旧轨道上去。

挥起打击革新派的大棒

当司马光上台时，路线虽然变了，但是革新派的力量还很强大。宋王朝内部十有七八是拥护新法的，顽固派不过少数。司马光自己也供认，支持他的少，反对他的多，“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感到不得人心，孤立得很。

那时，宰相蔡确和主持枢密院的章惇，都还在坚持新法，对司马光上台公开表示“不以为便”。他们敢于对司马光展开面对面的辩论，使许多倒退措施“断而复止”。他们毫不留

情地揭露司马光提拔的顽固派是“不逞之徒”。一次，司马光密荐了一批谏官，其中有他的亲戚死党范纯仁、范祖禹。章惇严正地指出：“大臣当明扬，何以密荐？”并说：按规定，这种职务应由大臣共同推选，你这是开后门，“此门不可浸启！”要求把他们撤职调任，迫得司马光叫嚣“臣宁避位”，用攒纱帽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要随心所欲地复旧，有许多困难，新法一时推翻不了，“祖宗之法”也就恢复不起来。

司马光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决心把革新派一网打尽，为推行反动路线扫清道路。

在司马光指挥下，攻击革新派的“弹章”纷纷出笼。对革新派不是黜，就是贬，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甚至天旱也成了革新派的罪名，他们造谣说：“惟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旱也”。顽固派深深懂得，不去掉革新派，他们就“无由自立”。这样，革新派被一批一批地打了下去。从元丰八年十月，陆佃、蔡卞以“新进少年”的罪名被撤职，到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章惇被罢免，不到半年之间，革新派被驱逐一空。谁如果不愿被撤职，那是可以的，但必须背叛新法，当投降派。蔡京就是一个典型。当司马光限定五天内废止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讲行不通，只有蔡京限时限刻做到了。司马光欣喜若狂地说：“假使人人同你一样，我的路线还怕推行不开吗！”就这样，混进变法阵营的投机分子蔡京，竟然成了顽固派头子司马光的大红人。

在“举贤才”的背后

在打击革新派的过程中，司马光飞黄腾达，大权独揽，于元祐元年闰二月当上了宰相。他懂得，没有一批帮凶，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整顿”不了“乾坤”的。因此，他一刻也没有放松扩大顽固派的阵容。司马光手中有厚厚一叠花名册，装订得端端正正，封面上写着三个夺目的大字：“举贤才”。里面是他的同党、亲信、门徒以及其他对变法不满的人的名单。他们都是司马光准备提拔起来“协力赞成”推翻新法的对象。

“元祐开皇极，功归用老成。”司马光把一大批顽固派的死硬分子扶上台，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例如，老顽固派文彦博担任了“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被捧为“国之老成，可以倚信”。后来，吕公著受司马光之囑，接替了他的职位，继续贯彻复古倒退的路线，成为顽固派的另一个中坚人物。其他如范纯仁、范祖禹、苏辙等人，在推翻新法、全面复辟的反动事业中，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道学家程颐，是司马光所举“贤才”的另一种典型。他同司马光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密切的联系，是顽固派营垒中摇羽毛扇的人物。司马光吹捧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把他当作“圣世之逸民”推举了出来。这个原来什么也不是的“处士”，一下子当上了“国子监教授”，在几个月内又连续被提升了三次。程颐感激涕零，为司马光吹喇叭，抬轿子，并且炮制了一系列反对新法、主张复古倒退的舆论，成了司马光反动政

治路线的理论家。同时，程颐还以教育部门负责官员的身份重修《太学条例》，对王安石在教育方面的革新措施反攻倒算。

在司马光上台初期推举的“贤才”中，有一大批是所谓“谏官”，或言事官，如刘摯、王岩叟、朱光庭。他们的职责是写奏章、作演说，对重大政治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实际上他们是司马光的智囊团，是顽固派的喉舌，专门干抨击新法、抨击革新派的勾当，为“元祐更化”大造舆论。

为了搜罗党羽，司马光采取了一系列卑鄙无耻的手段。其中主要有三项：一是为遭到王安石变法打击的顽固派翻案。司马光当上宰相没几天，就为因恶毒攻击变法而受管制的顽固派郑侠“除落罪名”，并恢复了他的“旧官”。一个月后，司马光专门设立了所谓“诉理所”，鼓励变法过程中的“得罪者自言”，让他们诉冤，一时群魔乱舞，大批曾因反对新法而下台的顽固派又神气活现起来了。二是排斥新生力量。司马光提出，任用官吏，“不可不为之立资格”。凡是“年高资深”的，虽然劣迹昭著，只要反对变法，都可以重用。凡是年青有为的，只要反对复旧，就是“躁进”，就是“新进少年”，不但没有资格提升，还要请他滚！三是诱之以利禄，用种种封建特权作筹码，拉拢死党。司马光碰到所谓“士大夫”，总是关心体贴入微地问，收入够用吗？人们对此感到奇怪。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僦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轻去就耶！”原来，司马光是想用物质引诱来收买人心，使他的党徒死心塌地为顽固派的事业卖命。

这样，司马光拼凑了一个顽固派集团，一个大地主阶级的还乡团。这个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狗咬狗斗争，但在政治上都极端守旧，思想上都极端尊孔，对王安石变法不满意、有反感、要算账，因而在司马光全面复辟的反动路线下暂时统一了起来。

“司马牛！”

正是依靠了这个还乡团，司马光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厘革”新法。到元祐元年一月，王安石的革新措施基本上都被推翻，仅仅剩下了免役法、青苗法、将官法等寥寥几项。司马光意犹未尽，恶狠狠地发誓说，只要新法还没有全部废除，“吾死不瞑目矣！”不久，这几项变法措施也给取消了。这样，在司马光一伙的反攻倒算下，没有几个月，王安石变法的成果就被“剗革略尽”了。

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司马光的极端反动性和顽固性。他把王安石的变法路线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张牙舞爪地叫嚣说：“现在不争，权就要落入革新派手中了。”司马光对新法、对革新派寸土必争，毫不容情。哪怕只要同新法稍为沾上一点边，他都要彻底废除。而凡是“祖宗之法”，即使早就行不通了，他也非全盘恢复不可。就拿免役法来说，它本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司马光恢复差役法，显然是倒行逆施，造成很大的混乱，很快就推行

不下去了。然而司马光象蠢猪一样，碰破头也不懂得拐弯，反而气急败坏地说：“恢复差役制，不能不引起麻烦，但一定要干到底，坚如金石，纵然有害处，也不能动！”这个顽固党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司马光为了把反动政治路线贯彻到底，根本不讲道理，许多人都怕他，甚至连他的同党也受不了。范纯仁总算是他的亲信了，在恢复差役法时，范纯仁怕做得太过分，失去人心，主张慢一点，司马光却半句话也听不进，反而破口大骂。范纯仁吓得连连叹气，再也不敢讲话了。苏轼认为差役法并不比免役法优越，司马光就勃然大怒，气得苏轼责问道：“这不是不准我把话说完吗？”直到回家后，还连声呼喊：“司马牛！司马牛！”司马光这个死硬派妄自尊大，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真好象茅坑里的垫脚石，有那么一股又臭又硬的牛劲，竭力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

历史的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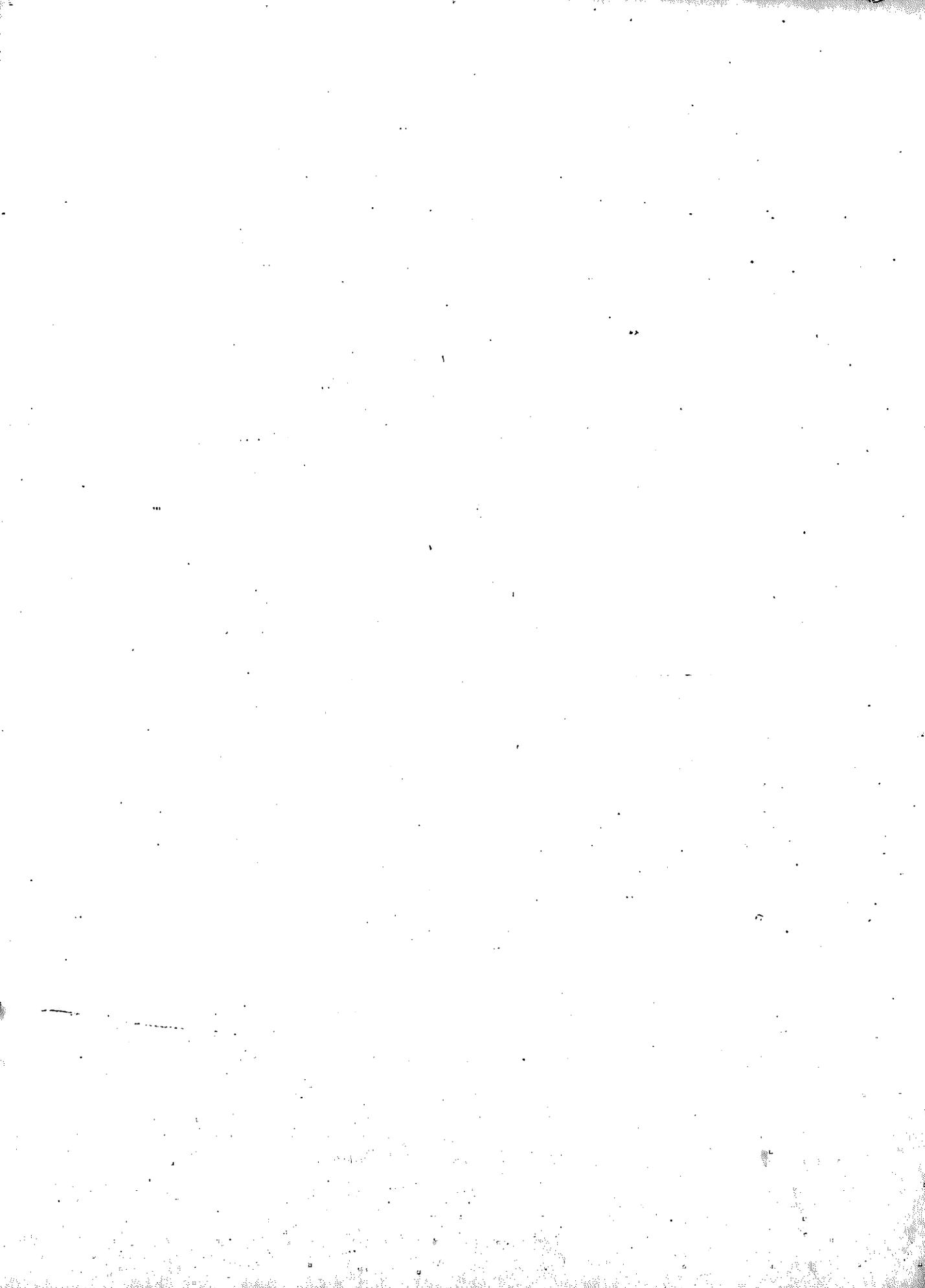
正当司马光盛气凌人的时候，患病在家的王安石“夷然不以为意”，明确表示反对。当他听到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吃惊地说：连这个也罢掉了吗？王安石在一封家信中深为不安地说：“为国忧者，新法变更尽矣。”并希望将来“必有能复之者”。但是，由于当时力量对比对革新派不利，王安石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顽固派的阴谋暂时得逞了。

就这样，司马光代表大地主顽固派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改先朝法度”，全面推翻新法，恢复变法以前的“旧政”；一件是“去安石之党”，把革新派整下去，让顽固派卷土重来。所谓“元祐更化”，实质上是一次复辟倒退事件。邵伯温为此吹捧司马光说：“公之勇猛，孟轲不如！”确实，顽固派的头子搞起复辟倒退来，是很凶恶的。

司马光是打着“整顿”朝政的幌子上台的，但他的倒行逆施却把北宋王朝推入黑暗腐朽的深渊，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复辟归来道更尊”。随着“元祐更化”而来的，是尊孔的狂澜。“温公所学者周、孔”，司马光是以孔学为思想武器，来“整顿乾坤”的。“元祐更化”在思想领域内必然地伴随着对具有法家倾向的王安石新学的反攻倒算，伴随着大地主顽固派尊孔的狂热。司马光在思想战线上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不准人们学习新学，学习变法思想，而强迫规定《论语》、《孝经》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为士大夫必读的教科书。在这种背景下，极端反动的道学兴起了，它是孔学的进一步发挥，对于维护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起了极为恶劣的思想影响。直到今天，一切闹翻案的复辟派，仍然把这种孔孟之道当作重要的思想武器。

“乾坤竟落腐儒手，但遣空言当汗马。”司马光一类顽固派上台，孔孟之道尊严了，就意味着倒退，意味着灾难。他们是历史的罪人，也是绝妙的反面教员。



◆
一 九 七 六 年

◆
第 五 期

◆
总 第 三 十 三 期
◆

XUEX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代号: 4-192

定价: 0.25元